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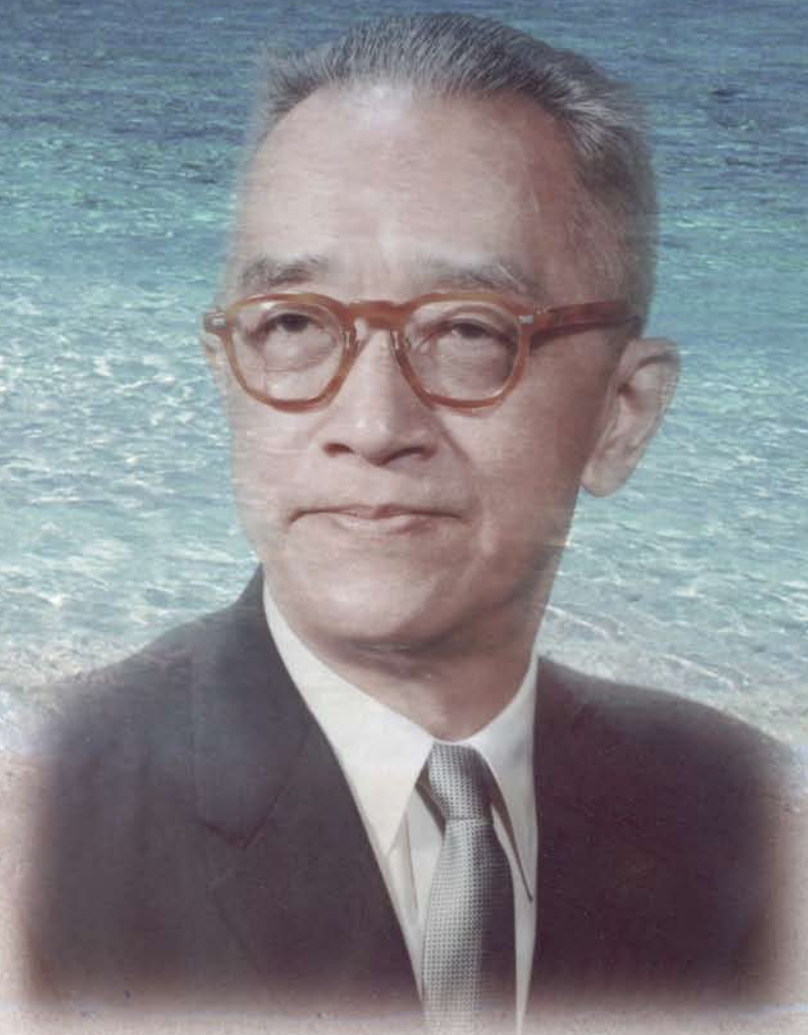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胡适研究通讯

2014年第1期（总第25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14年3月25日



公開檢舉是打倒
黑暗政治的唯一武
器。光明所到，黑暗
自銷。

題招商局三大案

胡適

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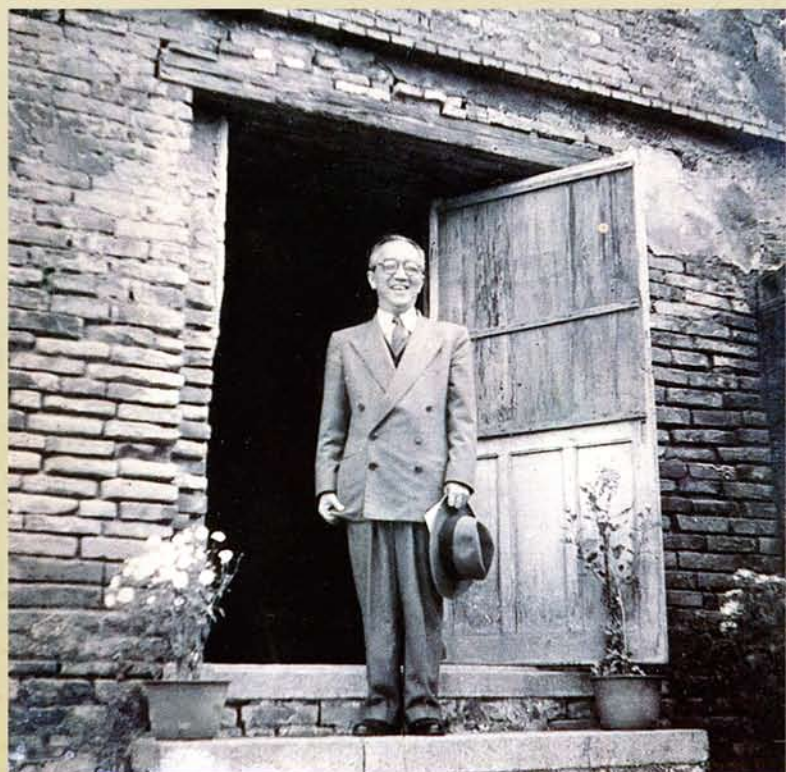
六十年前曾隨
先人寓居此地，今日
重遊，蒙 諸父老兄
弟姊妹歡迎，敬記謝
意。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 胡適

1952年12月26日胡適在永福國民小學題詞

1933年1月胡適為李孤帆編著《招商局三大案》
(現代書局，1933年)題詞，李建军先生提供

1952年12月26日胡適在台南永福國民小學受到歡迎的情形
永福國小提供



1952年12月26日胡適在台南永福國民小學留影
背景為儿时生活旧居之遗迹 永福國小提供

目 录

中华文化的开新与守成——胡适文化观的再解读	耿云志 (1)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Suh Hu (Hu Shih) (4)
胡适对美国各大图书馆《水经注》版本的利用：1943-1946	邹新明 (11)
从胡适的一封信看傅斯年苦心经营台湾大学之例	刘广定 (22)
林损与胡适——林损辞职事件评述	朱洪涛 (27)

中华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胡适文化观的再解读

耿云志

文化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就不会静止不动，永远僵立在一个地方。它要活动，要生长，要进步。这个过程是新陈代谢的过程。生命的存在形式就是新陈代谢，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要停止。由此我们知道，一种文化要存在，要生长，要进步，也要不断地新陈代谢。

这些年来，人们不断地强调传统文化，觉得好像传统文化若不大力提倡，真的就要陨灭了。实际上当然没有这么危险，若是真有这么危险，恐怕即使有人大力提倡，也未必能济事。

人们讲传统的时候，常常不很注意说明，第一，传统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已完成的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本身仍在流转变化的，仍在发展。第二，就我们中华文化而言，其传统有两种很不相同的精神，须要加以注意。一种是先秦文化的传统，那是一个真正百家争鸣的时代，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后来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化还时隐时现地出现多彩的姿态，实有赖于这些先秦经典所造就的活水源头。早在 80 年代，我曾说过，中国从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要取得顺利成功，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重现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思想自由竞争，显然最有利于发扬民族创造力，最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

另一种文化传统是秦汉开始形成起来，并逐渐得到强化，那就是奉儒家一派思想为正宗，排斥其他思想的传统。这个传统因为延续时间很长，离我们又很近，所以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尊奉的传统。

我们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尽管儒家思想一统的局面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两千年还是有变化的。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于韩愈时代的正统思想；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于王

阳明时代的正统思想。到了近代，秦汉以来的中华文化传统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这个挑战的核心问题是破除儒家思想至尊一统的局面，允许各家思想（包括外来的思想）自由竞争。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它反映在人们的主观意志上就表现为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在平常时期，它们之间的争持与互动，表现得不是那么突出，那么激烈。在某些文化转型的关节点，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激烈。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

新文化运动将近一百年了。近百年来，关于新文化运动一直争议不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说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们有一大罪过，就是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华文化断裂，使传统文化面临陨灭的危险。我在 1989 年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一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详细批驳了这种论调。那篇文章很长，讲了大量事实，做了详细分析。我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胡适、陈独秀等人所着力批判的是将孔孟一派思想定为一尊，排斥其他思想，指出它非常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不利于中国现代化。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第二，胡适、陈独秀等人都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对传统文化有很好的了解。他们知道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可以推陈出新的，哪些是已经腐烂和行将腐烂，不值得珍惜的。他们不可能笼统地搞什么全盘反传统，推倒一切古代文化的野蛮无知的举动。陈独秀的文字学研究，胡适的古代思想研究及其整理国故的成就，恐怕是当今许多大讲国学的人不能望其项背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首先说明，建设中华新文化，或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古代传袭下来的传统中华文化，成为

适应现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因为是在强烈的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中西文化关系，或者说，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中交织着开新者与守成者之间长期的，又是很激烈的争论。

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色彩，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稳健。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甚至顽固。

从理论上说，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翼。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我在前面指出，传统不是已经完成，再不变化的东西，传统文化不断地通过新陈代谢补充自己，丰富自己。所以守成的人，并非只守着远古时代老祖宗那一点家底儿。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一切新东西。这就像生物学上讲的遗传与变异的关系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种类也就渐渐形成，如果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新物种的形成便是不可能的了。文化的开新与守成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只有开新而没有守成，旧文化变成新文化也是不可能的。

因时间有限，这里不能全面讨论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论，以及文化转型实际的历史过程。张岂之先生希望我侧重谈一下胡适的文化思想，我现在把胡适作为开新一派人物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略为深入地揭示其主要观点。主要是谈他对于建设中华新文化，或者说，他对于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见解。

在文化论争中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或更具体地说，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

由于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特殊经历，中国人长期以来积淀出一种相当坚固的意识，即认为中华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与刚刚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共同性的文化。由此更进一步认为，中华文化自来是自我圆满的，无需借鉴与

吸取任何其他文化。当年清朝皇帝乾隆答复英国使者说，中华地大物博，不需要外国的任何东西，我们跟你们做点茶、丝等贸易，那是可怜你们。他的话最能反映出中国人固步自封的心态。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如果中华文化真的独特到与其他文化毫不相干的地步，那么第一，创造了中华文化的中国人与创造了其他文化的人类之间有无同一性？如果有同一性，那么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亦必有同一性。第二，既然具有同一性，那么，在近代世界，国与国之间，各族人民之间已经互相遭遇到一起的情况下，还能够彼此互不相干地完全孤立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吗？这第二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其实，意义非常深刻。有同一性，就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互相融通；没有同一性，就各自独立，类不相属，互不相干，无从相互借鉴与吸收，更谈不上互相融通了。事实上，有人是持有类似见解的。

胡适非常明确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¹很明显，胡适这里说的就是人类文化的同一性问题。

在确认人类文化具有同一性的前提下，再进一步讨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胡适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因生活的地域、环境等诸多条件的不同，各民族的生活习惯、风俗有明显的差别。例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东方人用刀叉。有人把这种差别看得很重，甚至有几分神秘性，这是大可不必的。另一种差别是发展程度的差别。这一点争论尤为激烈。不少人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要他们承认，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发展的程度高，这实在太有损中国人的自尊心了。但这却是事实。小舢板就是不如万吨巨轮的发展程度高；人力车，畜力车就是不如汽车、火

车的发展程度高；现代的城市管理，包括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卫生及其他公共事业管理，就是比土街陋巷的发展程度高。以此类推，许许多多的事实都可以说明，西方主要国家的近代文化确实要比尚未完全脱离中古形态的中华文化要高。由此就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事实上，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已经在逐渐地学习西方一些东西。但每一步都有阻力，每进一步都需经过斗争，从只学习器物、工艺技术和科学，到学习改革政治，实现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花了上百年的时间，仍未完全解决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态度的问题尚未获得真正解决。

有些中国人杜撰出一种说法，说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中华文化才是精神的。人就是贵有精神。所以，中华文化才是更具有人性的文化，是更高等的文化。

胡适很不客气地说：“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²胡适又说：“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³胡适批评中国的圣贤们往往过分片面地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要人们鄙视物质生活，提倡安贫乐道。而同时，却容忍贵族、官僚、富人们穷奢极欲。其说教带有明显的欺骗性质。胡适要求人们正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实在关系，认清物质生活的基本重要性，努力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提高精神上的追求。

有人说，物质文化要向西方学习，精神文化也要向西方学习，那岂不是“全盘西化”了吗？

事实上，胡适确实背着“全盘西化”的罪名，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我因为做胡适研究比较早，因此也是为他洗脱这项罪名比较早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前期，我就指出“全盘西化”只是反对折中论的一种提法，决不是完全以西洋文化代替中

华固有文化的意思。而且，胡适早已发现这个提法易使人误解，所以他曾郑重其事地公开声明，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胡适的真正意思，是不赞成主观地为中西文化交流设置界限。以往所谓只可学其技术、工艺，或只可学其物质文化，或设置所谓“中体西用”的框架等等，都是不必要的。胡适认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种文化互相交流，千千万万的人通过自己的实际体验，他们会慢慢明白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什么是可以提高他们生活的品质的。好的东西他们自然会吸收，不好的东西他们会舍弃。许多保守的人们总是担心，要不为中西文化交流设置界限，中华文化固有的许多宝贝。甚至中华文化的本根都会丧失掉。胡适理解保守主义者的苦心，他向他们指出：“各方面文化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⁴胡适的这个见解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见解，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许多人自炫如何热爱本国文化，对本国文化如何自信，其实，不肯用真正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中西文化交流，害怕自由交流，互相碰撞的结果，导致中华文化的毁灭，这哪里还有自信心？

所以，胡适主张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要建筑在自觉反省的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反省，第一，要承认文化是整个民族集体创造的，所以文化的本根在“那无数无数的人民”，这个本根不可能被毁灭。第二，要正视本民族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化的长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最聪明的做法。相反，讳疾忌医，自欺欺人，只能导致自身的衰败。正因如此，胡适认为凡真正有志于发展中华文化的人，都应该多注意反省本土文化的

缺点、弱点，多注意西方文化的优点和强点，取长补短，这才能真正做到中华文化的复兴。

我在这里要特别向大家说明一点：胡适在国内经常批评固有文化的缺点，致使一些人误解胡适崇洋媚外，这是天大的冤枉。凡是对胡适多少做过一些研究的人，在我们比较了解胡适的学者圈内，有一个很平常的知识，可以说是关于胡适的 A、B、C。是什么呢？就是，胡适虽然在国内经常严厉地批评中国文化的种种缺点，但在国外，做同样题目的讲演时，他却只是大讲中国文化的种种优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人对此有兴趣，想知道个究竟，请你看看胡适在美国所做的讲演，有英文本，也有不少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仔细看看就知道了。胡适的这种态度，是由他的使命感决定的。他毕生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结合，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为此，他自己担起让两种文化密切接触，互相切磋，互相补充，互相融通的责任。而这必须使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胡适在中国、外国以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化，其良苦用心在此。

文化的发展，开新与守成交互为用。在守成的基础上开新，在开新中，兼顾守成。开新不只

是概念、词句的开新，应该具体地了解、研究新的东西，外来的东西，看它究竟是否适合我们的需要。适合的，人们自然会接受，久而久之，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了。守成的人，也不能只是一味地保守旧东西，一味地排斥新东西。一方面对旧东西要整理研究，要推陈出新。要整理研究，要推陈出新，一定要借鉴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像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者，他们就是用新方法整理研究旧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与胡适之间从未发生大的矛盾，他们的基本方法都是相通的。所以中华文化的开新与守成，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应严格按照科学方法来从事实际的研究，发扬固有文化的优秀的东西，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一切有益的东西，达到开新与守成的目的，共谋中华文化的复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 1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 64 页，亚东图书馆 1925 年再版。
- 2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 4 页，亚东图书馆 1930 年。
- 3 见同上，第 6 页。
- 4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论学近著》，第 555 页。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Suh Hu (Hu Shih)

编者按：本《通讯》自 2013 年第 3 期开始，陆续发表由席云舒博士提供的胡适先生散佚英文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一份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时所写的课业论文：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此手稿由席云舒博士后，我们发表在这里。

I. Locke and His Time

The Two Treatises were published in 1690 and the Patriarchs by Sir Robert Filmer, to which the first of Locke's Treatises was an answer, appeared in 1680. According to Fowler, the first Treatise must have been written between 1680 and 1685. Mr. Fox Bournereferred the date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econd Treatise to the time immediately preceding and concurrent with the English Revolution, probably between 1685-1688. Fowler remarked that the last few chapters of the Second Treatise must have been written during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in England, for they exhibit a great deal of passion. Locke, in his Preface, declared the Treatises to be

intended to justify the reign of William and Mary for whose accession Locke had labored.

From the time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to the Revolution of 1688, many treaties and pamphlets had been written on the rights of the King and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The controversy was carried on with great rigor on both sides. Many a new theory, like the social contract of Hobbes and the Patriarchal right of Sir Robert Filmer, had been advanced. Locke was an ardent sympathizer of the popular movement. When the Patriarchs appeared in 1680, advocating the natural subjection of mankind, naturally Locke felt a keen indignation and found himself duty-bound to undertake to refute these new but ridiculous theories. After he had finished his refutation of the Patriarchs, he then, in his Second Treatise, undertook to set up what he thought of the origin of the King and the people.

In doing this, he not only justified the revolution of 1688, but also,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incidentally, expounded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English Civil War, and preached unconsciously the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later expanded by Rousseau and others led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f 1776,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 and the numerous revolut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 most important pag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century. Incidentally I may mention the fact that this new political theory, especially as expounded in Rousseau's Contract Social,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lements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the recent Revolution in China.

II. The First Treatise

To the modern reader, the first Treatise is of little or no interest. It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a piece of argumentation based on theological assumptions, intended to repudiate the biblical distortion of Sir Robert Filmer. Filmer's assumptions may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1. God created Adams and gave him absolute

power over the world.

2. Men are born in subjection to their parents and therefore are not free.

3. Not only Adams but also the succeeding patriarchs, had by right of fatherhood, royal authority over their children.

4. The subjection of Eve by God's command, "He shall rule over thee", as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grant of government.

Locke's refutations may also be summed up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1. Paternal power, which parents have over their children to govern them for their good till they come to the use of reason, is quite a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political power which consists in laying down laws, administering them, and protecting the property of the members of a civil community.

2. God gave no immediate power to Adam over man and over his children. The passage in Gen. I : 28 which Filmer quoted as the basis of his argument, only means that God gave Adam the right in common with all mankind—the right of making use of the fish, the fowl and every living being, in order to preserve life.

3. Man are born with the same right of self-preservation as Adam, and therefore as free as Adam.

4. The subjection of woman is not a sufficient basis of government. Filmer quoted the Decalogue "Honor thy father", but omitted "and thy mother".

The other points, like the theory of property and the origin of the civil society, Locke took up in greater length in the Second Treatise.

III. The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

For the sake of clearness, I have divided the Treatise into the following sections:

§1. Paternal and Political Powers
(Chapters I, VI and XV)

Locke took pains to distinguish the paternal power from the political power. Paternal power is that which parents have over their children, arisen from their duty to take care of their offspring during their imperfect state of childhood. "We are born free as we are born rational." But during this period of childhood, we need the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of our parents. When the children have reached the age of discretion and reasoning, the father loses his power over them. "The father's Empire then ceases and he can from thence forwards no more dispose of the liberty of his son than that of any other man", though the son still owes his parents honor and respects all his life.

Political power Locke defines in chapter I, as the "right of making laws with penalties for the regulating and preserving of property, and of employing the force of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execution of such laws and in the defence of the commonwealth from foreign injury, and all this only for the public good." In chapter X V he again defines it as "that power which, everyman having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as given up into the hands of the society, and therein to the governors, whom the society has set up over itself, with the express trust that it shall be employed for their good, an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Besides these powers, there is the despotical power which Locke defines as "an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one man has over another, to take away his life whenever he pleases."

"The great mistakes of late about government", says Locke, "have arisen from confounding these distinct powers." "Nature", he concludes, "gives the paternal power; voluntary agreement gives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forfeiture gives the despotical power."

§2. The State of Nature (Chapters II & III)

The state of nature is a state of perfect freedom to act, to dispose of possessions and persons, as one

thinks fit,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 law of nature, without asking leave, or depending upon the will of any other man. It is also a state of equality, "wherein all the power and jurisdiction are reciprocal, no one having more than the other". This equality of men by nature was looked upon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mutual love among men. There is a law of nature which teaches all mankind that all being equal and independent, no one ought to harm another in his life, health, liberty, or possessions. The law of nature governs mankind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us, though this is a state of liberty, yet it is not a state of licence.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 of nature is put into the hand of every man. When an offence is done, the sufferer has the right to punish the offender, either to repair the injury done, or to restrain him from repeating the offence. Reparation and restraint are the two only reasons why man may "lawfully" do harm to another. The fact tha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very man has the right to punish a criminal, may be seen in the story of Cain who, having committed the crime, cried out: "Every one that findeth me shall slay me!"

But it is unreasonable that men should be judges in their own cases. For self-love will make men partial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friends, and ill-nature, passion, and revenge will carry them too far in punishing others. To remedy this inconvenience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men should set up civil government with common judges and common laws.

If to avoid men being judges in their own cases is a cau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society, then, absolute monarchy is not to be tolerated. For, if one man commanding a multitude, has the liberty to be judge in his own cases, and may do to all his subjects whatever he pleases without the least question or control, then the evil is as great as when men are judges in their own cases.

§3. The State of War (Chapter III)

The state of war is a state of enmity and destruction. Man attempts to get another man into his absolute power and thus puts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him, it being understood as a declaration of a design upon his life. For in doing this, he is against another man's right of liberty, that is, to make him a slave. "It is lawful to regard such an aggressor as an enemy and treat him as souls, i. e. to kill him."

To avoid this state of war is one great reason of men's putting themselves into society and quitting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state of war is over, when men are equally subject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aw. But if there is injustice done under the name of the law, it is still violence and injury, and the sufferer is left to the only remedy, an "appeal to heaven", which is Locke's synonym of rebellion.

§4. Liberty (Chapter IV)

In the state of nature, man is free from any superior power on earth and not be under the will of another man. This Locke terms as the natural liberty of men. When men have come into society, their liberty is to be under no other legislative power but that established, by consent, in the commonwealth, not under the dominion of any will or restraint of any law, but what the legislative shall enact according to the trust put in it. This is the liberty in society. "Freedom of men under government is to have a standing rule to live by common to every one of that society and made by the legislative erected in it; a liberty to follow my own will in all things where that rule prescribes not; and not to be subject to the inconsistent, uncertain, unknown,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 man."

This freedom from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is so necessary to and closely joined with man's preservation, that he cannot part with it except by what forfeits his preservation and life together. He who parts with this freedom, does thereby enslave himself to another.

§5. Property (Chapter V)

Locke's theory of property is very important. He first assumes that God who has "given the earth to the children of men", has given it to mankind in common for the support and comfort of their being. Therefore no body has originally a private property. But every man has a property in his own person. His labor is his own property. "Whatever he removed out of the state that nature has provided and left it in, he has mixed his labor with and joined to it something that is his own, and thereby makes it his property." He who kicks up the acorns from under the oak, or gathers the apples from the tree, has certainly appropriated them to himself. His labor has freed his property in them.

Then any one may ingress as much as he can? "Not as!" says Locke. God has given all things to us as far as we can "enjoy". Nothing was made by God for man to "destroy or spoil". What is more than a man can enjoy is more than his share and belongs to others. Locke gives as the Rule of Property: "Every man should have as much as he could make use of."

To Locke, labor is not only the determining factor of property, but also the determining factor of value. "Whatever bread is worth more than acorns, wine than water, cloth or silk than leaves, that is wholly owing to labor." "The straw, bran, bread of an acre of wheat is more worth than the product of an acre of as good land which lies waste." "It is labor, then, that puts the greatest part of value upon land, without which it would scarcely be worth anything."

This view of labor a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of value is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fact that it has been later used by the advocates of socialism, as one of their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against the capitalist. It has, however, been pointed out by modern writers that this conception of value is one-sided and not trust worthy. For the value of a commodity is determin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equally significant as, if not more important than labor. Of these, may

be mentioned, for example, utility and supply.

Locke also discussed the origin of the use of money which being not important in own discussion, is here omitted.

§6. Civil Society (Chapters VI, VII&VIII)

Although Locke expressly declares that neither paternal power nor filial honor and respects could give the father the regal authority, yet he admits that “it is obvious to conceive how easy it was in the first ages of the world for the father of the family to become the prince of it.” For, when the children have grown up, they naturally ask the question: “Who is fitter to rule?” The choice naturally falls on the father: “Thus the natural fathers of families become politick monarchs of them too: and as they chanced to live long, and leave able and worthy heirs, for several successions, or otherwise; so they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hereditary, or elective kingdoms.”

This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political state from the patriarchal family, which has been accepted by modern authors as the most reliable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satisfied Locke. He incidentally and reluctantly touched upon it, but soon dismissed it and went on to advance what he thought to be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Here is Locke’s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There, and there only is political society, where every one of the members hath quitted his natural power and resigned it up into the hands of the commonwealth, in all cases, that excludes him not from appealing for protection to the law established by it.” This resignation of the natural power is done in any one of the two ways: whenever any member of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nter into society to make one body politic under one supreme government; or when any one man joins himself to, and incorporates with any government already made. Man being by nature all free, equal, and independent, no one can be put out of his estate, and subjected to the political power of another without his consent.

The only way whereby a man “divests himself of his natural liberty, and puts on the bonds of civil society, is by agreeing with other men to join and unite into a community for their comfortable, safe, and peaceable living one amongst another, in a secure enjoyment of their properties, and a greater security against any, that are not of it.” This agreeing to unite into one political society is “all the compact that is, or needs be,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that enter intoor make up a commonwealth.” This the contract social.

So far the contract theory of Locke does not greatly differ from that of Hobbes. Here comes the difference. Hobbes’s social contract is only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subject, the sovereign power is not a party of the contract and therefore is not responsible to the people. Locke ridicules this idea. “This”, says Locke in a tone full of rigor and scorn, “is to think that men are so foolish that they take care to avoid what mischiefs may be done them by pole-cats, or foxes, but they are content, nay, think it safety, to be devoured by lions!” So he thinks that “if he who judges, judges amiss, in his own or any other case, he is answerable to the rest of mankind”. Locke goes on to denounce absolute monarchy in the famous passage which follows. “such a man (the monarch), however intitled, Czar, or Grand Seignior, or how you please, is as much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ith all under his dominion, as he is with the rest of mankind... In absolute monarchiesthe subjects have an appeal to the law, and judges to decide any controversies, and restrain any violence, that may happen betwixt the subjects themselves This everyone thinks necessary what security, what fence is there against the violence and oppression of this absolute ruler? the very question can scarce be borne. They are ready to tell you, that it deserves death only to ask after safety! ... As for the ruler, he ought to be absolute, and is above all such circumstances; because he has power to do more hurt and wrong, it is right when he does it. To ask how you may be guarded from harm, or injury, where the strongest

hand is to do it, is presently the voice of faction and rebellion! ...But that he should still retain all the libert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increased with power, and made licentious by impunity? ”

§7. Ends of Political Society: Forms of
Commonwealth
(Chapters IX& X)

To Locke the ends of a civil society is to preserve property which includes liberty, life and possessions, to secure peace, safety, and public good by supplying the three defects of the state of nature, namely: law, judge, and executive power. “The power of the society can never be supposed to extend farther than the common good.”

As for the forms of commonwealth, Locke mentions the following:

1. Democracy: where the majority employ the whol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laws are executed by officers of their own appointing.

2. Oligarchy: where the power is put into the hands of a few select men.

3. Monarchy: where the power is put into the hand of one man. When the power is entrusted to one man for life only, it is elective monarchy. When the power is handed down to his heirs, it is hereditary monarchy.

Absolute monarchy is, according to Locke, no form of civil government. For, as has been stated above, the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is to avoid and remedy the inconveniences of the state of nature which necessarily follow from every man's being judge in his own case. But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 the King being supposed to have all both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in himself alone, there is no judge to be found, not appeal open to anyone. “Hence”, says Locke, “it is evident that absolute monarchy is indeed inconsistent with civil society, and so can be no form of civil government at all.”

§8. Power of Civil Government
(Chapters XI, XII, XIII)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 powers of government: First, legislative or law making power; second, executive or law administering power; and third, federation, or the power of “war and peace, leagues and alliances, and all the transactions with all persons, and communities without the commonwealth.”

It seems to me that all these terms as used by Locke mean quite different things from what they would mean to-day. By “legislative” he not only means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but also implies the power of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the laws, which power now belongs to the modern judiciary. For Locke did not establish a distinct judicial power, and furthermore, speaking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he said among other things: “it (the legislative) cannot assume to itself a power to rule by extemporary, arbitrary decrees, but it bound by promulgated standing laws, and known, authorized judges.”

By “executive”, he meant only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he executive of the law, which is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modern government. Perhaps he also included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in the commonwealth. Whereas by “federative” he actually meant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and commandership of armed forces, which properly belong to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oday.

Thus it is obvious that Locke does not share with Montesquieu much of the credit of the theory of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powers of government. However, he deserves credit for the fact that he was the first one to advocate the separation of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s. He was also the first to advocate the supremacy of the legislative over other powers. He thinks that in a constituted commonwealth, there can be but one supreme power that of the legislative, --- to which all the rest are and must be subordinate. “For what can give law to

another must needs be superior to him.”

The legislative power is not necessary to be always in being, but the executive must be always in being. But what if the executive power will make use of the force of the commonwealth to hinder the actions of the legislative? “I say,” says Locke, “using force upon the people without authority and contrary to the trust, is a state of war with the people. Th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remove it by force. In all states and conditions the true remedy of force without authority is to oppose force to it.”

§9. Prerogative and Tyranny (Chapters X IV & X VIII)

Locke defines prerogative as “the power to act according to discre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without the prescription of the law, and sometimes even against it.” The causes of the rise of prerogative are twofold. First, the legislative power may not be in session, or too numerous, or too slow for the dispatch requisite to execution. Secondly, it is impossible to foresee, and so to provide for all accidents and necessities that may concern the public. “This power, when used in the benefit of the community, is undoubted prerogative, and never is questioned. For the people are very seldom or never scrupulous on point when it is in any tolerable degree employed for the use it was meant and not expressly against it.”

Thus the prerogative is not given by the understood consent of the people. “Therefore they have a wrong notion of government, who say, that the people have encroached upon the prerogative, when they have got any part of it to be defined by positive laws.” Locke’s arguments are twofold. First, a rational being cannot be supposed to put himself into subjection to another for his own harm. Secondly, the English history shows that prerogative was always largest in the hands of the wisest and best princes.

But who shall be judge when this power is misused? Locke’s answer to question is that the people have no other remedy when they have no

judge on earth except “appealing to heaven”. The people must judge whether they have just cause to make this appeal to heaven. “This judgment they cannot part with, it being out of man’s power to submit himself to another, as to give him a liberty to destroy him.” However,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this does not mean leading to frequent disorder. For the inertia in men is so great that this appeal to heaven does not operate until the inconvenience has become so gross that the majority feel it, and weary of it, and find it necessary to have it amended.

§10. Dissolution of Government (Chapter X IX)

Locke distinguishe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government. I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ety, every man returns to the state of nature he was in before, with a liberty to provide for his own safety as he sees fit in some other society. But in a dissolution of government only the agents are changed, while the society still exists. The society may be dissolved by foreign conquest. When the society is dissolved, the government cannot exist.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is dissolved in any one of the three ways. First, when the legislative is altered. Secondly, when the executive neglects and abandons its charge, so that the laws already made can no longer be put into operation. This is a state of anarchy. Thirdly, when the legislative or the executive acts contrary to their trust. In the last case the people dissolve the government by force.

To the objection that the theory of appeal to heaven lays a foment for frequent rebellion, Locke gives three answers. First, the hypothesis does no more than any other. The people, when ill-treated, will always be ready to have a chance to ease themselves from a burden which sits as heavy upon them, even without this fomenting theory. Secondly, such revolutions will not break out upon very little mismanagement. The people are always patient in forbearing it, until it becomes intolerable to them.

Thirdly, this doctrine of a power in the people of procuring for their safety anew by a new government is the best fence against rebellion and the most probable means to stop it. For, if the sovereigns know that they are safe on their thrones as long as

they are faithful to the trust which the people put in them, then there will be few rulers who will be so foolish as to tread upon the people to their own peril.

§11. Criticism

It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that Locke's view of value is one-sided, if not entirely false. It has also been incidentally pointed out that Locke's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tate is not generally accepted by modern authors. Careful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actual observations on the primitive people existing, have convinced the modern scholars that the real origin of the political society is to be

found in the patriarchal family. The state of nature as described by Hobbes and Locke is, as Fowler puts it, a mere Fiction. The state is an organic growth, not anything artificially made by contracting parties.

Again, Locke's concep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is too much individualistic. To him the state exists onl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individual. He thinks that, if the state is conquered by foreign invasion, the individual is restored to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has perfect liberty to seek his own safety and protection in some other society or state (chapter XIX). Does the individual exist for the state, too? Does he exist for other individuals in the state too? Has not the state other duties than the mere safety and prot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据胡适手稿整理)

胡适对美国各大图书馆《水经注》版本的利用：1943-1946

邹新明

1943 年 11 月 8 日，胡适收到王重民 11 月 5 日的来信，信中所附其《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震全赵两公案》一文，引起胡适对“赵戴水经注案”，即所谓戴震窃取赵一清《水经注释》学术公案的再度关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得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¹当晚胡适写长信给王重民，发表了自己意见。胡适对此案本想全力以赴，速战速决，然后再回到拖延已久的《中国思想史》的撰写。胡适没有料到的是，从此开始，直到 1962 年去世的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用在“《水经注》案”上，写出的校勘考证文字有二百多万字。胡适海外《水经注》研究主要集中在 1943 年至 1946 年，1949 年至 1958 年再度客居美国期间，虽仍继续研究，但从规模和投入上看已

经不能与之前的时期相比。本文对于胡适《水经注》研究对美国各大图书馆利用的考察主要限定在 1943-1946 年，所涉及的文献只限于《水经注》版本。

一. 胡适对美国各大图书馆《水经注》版本利用概况

胡适重审“《水经注》案”，主要的方法是尽量收集相关版本，进行对勘。胡适重审此案七个月之后，曾指出：“这个百五十年大疑案所以越审越糊涂，都是因为承审的学者们都不曾费这一番‘笨工夫’。他们也没有我的好机会，可以聚集这些版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比较，对勘。我的最大幸运是能在海外收集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的《四库》钞本和几种不同的刻本。”²因此，胡适的《水经注》研究，相关版本的收集至关重要。而此时的胡适身在海外，无法利用国内丰富的相关

文献，只能转而依靠美国的公共和大学图书馆。美国的图书馆相关收藏是否满足了胡适的《水经注》研究需要呢？从胡适留下的相关文字看，虽然海外用书不免有“小不方便”，但他对美国图书馆界的《水经注》收藏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如他在 1944 年 2 月 1 日给王重民的信中说：“邀天之福，我能有此三个月的闲暇，又能得十八九部《水经注》供我参考。我们在北京极盛时，亦不能得十八九部《水经注》在手边！”³1944 年 3 月 5 日，胡适在给王重民的信中又说：“在海外能得近二十种的《水经注》，可谓奇遇！在北平盛时，恐亦无〔此〕奇遇！”⁴1949 年 10 月 4 日，胡适在给王重民的信中又说：“美国藏《水经注》之多，远出我意料之外！”⁵

至于胡适在此期间利用美国各大图书馆查阅的《水经注》版本的种数，他在 1945 年 10 月 14 日给王重民的信中说：“将来我回到北平，必先收买《水经注》各本，作一纪念。但恐无此坐拥《水经注》三十多种的福气了！”⁶1946 年 6 月 17 日，胡适在自美回国的船上写下《在海外所用〈水经注〉本子简目》，列出的各种《水经注》版本有 33 种之多，具体如下：

1. 永乐大典水经注影印本（续古逸丛书）哥
2. 杨慎《水经》三卷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盛夔刻本平
3. 黄省曾刻水经注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刻平
4. 吴琯刻水经注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刻国
5. 朱谋埠水经注笺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李长庚刻
 - （5）初刻初印本哥
 - （14）初刻修改本（别下斋旧藏赵一清朱墨校本）平
6. 钟惺《水经注钞》六卷顺治十五年赵吉士重刻“三注钞”
 - （三注者，《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注，与郢注）本哈
7. 项纲刻水经注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刻本国

8. 黄晟刻水经注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翻刻本国
9. 何焯校的水经注
 - （14）赵一清过录本（朱墨校本）平
 - （8）杨希闵过录本重录残本国
 - （25）杨希闵《汇校》本哥
10. 全祖望校的水经注
 - （14）赵一清过录本（朱墨校本）平
11. 胡渭《禹贡锥指》（《经解》本）国
12. 沈大成校的水经注
 - （8）杨希闵过录本重录残本国
 - （25）杨希闵《汇校》本国，哥
13. 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伪影印本（四库珍本）哥
14. 赵一清朱墨校本《水经注笺》平
15. 赵一清《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附录二卷
 - 《四库全书》写本（甘泉岑谔钞本）葛
 - （26）初刻本（乾隆五十一年刻）据王先谦《合校》本国
16. 初刻初修本（乾隆五十一年）芝
17. 修改重刻本国
 - （国会这本是嘉庆初年印本，故避讳“琰”字）
18. 张寿荣刻本（光绪六年参用初刻本与修改本）哈，哥
19. 章寿康刻本（光绪六年翻刻乾隆五十九年修改本）葛
20. 戴震早年校水经注残本（题“东遘氏”，过录于黄晟刻本）哈
21. 戴震水经注聚珍版本（四部丛刊影印本）适
22. 戴震水经注自刻本国
23. 孔继涵水经释地（章寿康刻本）葛
24. 戴震水地记一卷（孔继涵刻本）国
25. 杨希闵《水经注汇校》光绪七年刻本国，哥
 - （此本收《朱笺》，何焯，沈大成，赵一清，戴震五本）

26.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光绪十八年刻本国

(此本收戴校官本,《朱笺》,赵一清初刻本,孙星衍董祐诚五家)

27.王梓材董沛“全氏七校水经注”光绪十四年

薛福成董沛刻本国

28.王梓材全校水经郦注水道表四明丛书本哥

29.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光绪三十一年国

30.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国

31.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圣心”第二期国会图书馆赠我 Photostat 本适

32.汪士铎水经注图咸丰十一年刻哥

33.郑德坤水经注引得(用王先谦《合校》本)适⁷

这里的“国”,指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哥”,指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葛”,指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哈”,指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芝”,指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平”,指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适”,指胡适个人收藏。据笔者粗略统计,美国各大图书馆中,胡适利用《水经注》版本最多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有 17 种之多,其他依次为:哥大 9 种,哈佛 3 种,普林斯顿 3 种,芝加哥 1 种。此外,北平图书馆存国会图书馆善本 6 种,胡适收藏 3 种。除去北平图书馆善本和胡适个人收藏,胡适利用美国各大图书馆的《水经注》版本共计 24 种。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存在汇校本、过录本等情况,有几种《水经注》版本实际上是一种算作多种。如果按照这种算法,胡适利用美国各大图书馆的《水经注》版本达 29 种之多。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胡适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水经注》版本数量远远高于其他三高校图书馆。除了哥大中文藏书较多之外,笔者推测,当年胡适客居纽约,到哥大借书最为方便,应是首先在哥大查找相关版本,然后再求诸其他图书馆。

胡适的《水经注》目录表明,他所利用的美国图书馆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芝加哥、哈佛、普林斯顿四家大学图书馆。1944

年初,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曾提出计划,拟将美国各大图书馆所藏罕见中文图书缩微复制。胡适与王重民往来书信中曾讨论此事,1944 年 3 月 22 日,胡适给王重民的信中说:“关于守和提议 microfilm 此邦善本书之事,鄙意有几点:(1)应先从调查开书目入手,兄可先从国会藏书入手,次则哥大,次则哈大,次则李太(李太,即普林斯顿——引者注)。”⁸此或可代表胡适对当时美国图书馆界中文收藏的认识,与胡适利用《水经注》版本的各图书馆基本一致,只是没有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恰好在此日的信中,胡适提及:“我廿九日去芝加哥看看他们的藏书,”⁹说明此时胡适对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收藏还不甚了解。胡适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看过其中文收藏之后,在 1944 年 4 月 8 日给王重民的信中谈到他对该馆中文收藏的总体印象:“今天上午去看芝大藏的中国书,颇惊其种类册数之多,可称此邦第四(或四、五之间?) (尚未全见其新得之 Newborn Collection)。”¹⁰结合上述资料,胡适对美国各大图书馆中文图书收藏的排名依次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最后两馆排名可能在伯仲之间。

二. 胡适利用美国各大图书馆《水经注》版本具体考察

1942 年 9 月,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客居纽约,重新开始读书作文的学者生活。独居纽约,没有多少个人藏书,也没有研究助手,那么他是如何获得美国各大图书馆的馆藏信息的,这中间又得到哪些人的帮助?本节将根据胡适相关书信、日记、文章,略作考察。

(一) 胡适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水经注》版本情况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收藏居美国各大图书馆之首,且当时有王重民在那里工作,因此成为胡适海外《水经注》研究最为倚重的图书馆。

胡适后来在谈及《水经注》研究缘起时曾说:“我因为王重民先生的劝告,于十一月下半到美

京国会图书馆，借出了馆中所藏各种《水经注》板本”¹¹。胡适1943年11月18日给杨联陞的信中说：“我为此事，星期六去美京，拟再费几日工夫，为此事多收点材料，”¹²据此，胡适首次到国会图书馆借阅各种《水经注》版本，应在1943年11月20日（周六），或是11月21日之后数日。另1943年11月26日王重民致胡适书信：“昨天放假，《水经注》等书未寄出，今早已打包，即可付邮了！”¹³此信可证明，胡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几日《水经注》之后，办理了借阅手续，由王重民代为邮寄回纽约。12月2日，胡适致信王重民：“昨天下午收到寄来的书一箱，”¹⁴即胡适在12月1日收到从国会图书馆借的第一批《水经注》。至于所借具体书目，笔者从胡适与杨联陞的往来书信中查得一些线索。胡适1943年11月18日致杨联陞的信中说：“哥大只有影本《永乐大典·水经注》，而无孔刻戴校《水经》。今回去美京，拟再检孔刻本及全氏本一查。”¹⁵此处孔刻本，指孔继涵刻戴震校《水经注》，全氏本则指全祖望校《水经注》。此两种是胡适11月20日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的重点，或在胡适借阅之列。胡适在是年11月28日致杨联陞的信中则明确说明了从国会图书馆借得的两种《水经注》版本：“我向国会馆借得了一部项綱刻本，一部王先谦‘合校本’。”¹⁶其中项綱刻本，指康熙五十四年（1715）项綱所刻《水经注》，列胡适《水经注》目录第7种；王先谦“合校本”，指光绪十八年（1892）王先谦所刻《合校水经注》，目录第26种。

此后，随着研究的展开，胡适需要查阅其他版本《水经注》及相关资料，这主要是通过王重民的帮助实现的。王重民1939年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鉴定和整理中国古籍善本，直至1947年归国。1942年11月22日，大约胡适卸任两个月之后，王重民、刘修业夫妇致信胡适，拟于12月4日到纽约，并希望次日拜访胡适。信末说：“先生如有需要参考之书，请先示知，当敬为携上也。”¹⁷五天之后，王重民在11月27日给胡适的信末再度表示：“先生如有需用参考之书，则请赐一短札，谨当带上也。”¹⁸于是胡适在11月29日的复信中，

告诉王重民自己正开始写汉代思想史，请王重民代借四种书，并请王重民做一个近代学人阅读研究《道藏》相关文字的目录。¹⁹此后两人书信频频，主要内容是胡适请王重民代借图书，代查资料，并讨论相关学术问题。

王重民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又能方便接触美国国会图书馆丰富的中文收藏和北平图书馆寄存的善本，自然成为胡适最为信赖依靠的学术助手。查《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从1943年11月5日王重民致信胡适重提“《水经注》案”，至1946年5月29日胡适回国前，两人通信达161封之多，篇幅占整个通信集五分之三强。王重民不仅帮助胡适借阅相关图书，而且帮助查找了很多有用的资料线索，如赵一清卒年的相关资料，于文襄手札等，并对胡适的研究成果提出讨论意见。可以说，胡适海外《水经注》研究过程中，对其帮助最大者非王氏莫属。

王重民帮助胡适借阅、查阅国会图书馆《水经注》版本的大致情况如下：

（1）孔、段所刻《戴集》内《水经注》序、跋之比勘

孔刻《戴集》指清人孔继涵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1777-1779）编刻的《戴氏遗书》，包括戴氏著作十五种，收入《微波榭丛书》。段刻《戴集》指戴震弟子段玉裁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印的“经韵楼本”《戴东原集》。

1943年11月13日，胡适致信王重民，请其代查此两种戴氏集子序、跋等之异同，目的为确定戴震校《水经注》两种版本的时间：“请用孔刻《戴集》与《水经注》一查：（1）孔刻本《水经注》戴《自序》有无年月？与段本有无异同？《孔序》年月为何？提及《大典》本否？（2）段刻《戴集》本《书〈水经注〉后》，段氏校记说‘此篇删去二百余字，以其语已见于前篇也’。乞查孔本此篇有无删节—我疑其无删节一如未删节，乞抄段本删去之部分见示。此篇有‘乙酉秋八月（乾隆三十）’的纪年，远在东原入馆之前，故值得注意也。”²⁰

11月16日，王重民回复胡适：“嘱查各节，

孔、段所刻《戴集》内《水经》酈道元注序文字相同，孔刻本《戴氏水经序》亦同，三本都不著年月。（孔继涵序云：‘东原氏之治《水经注》也，始于乾隆之西夏（“之酉”，应为“乙酉”之误，一引者注），越八年壬辰，刊于浙东，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京师。’后述用《大典》校勘事，而称此本为旧本，则戴氏作序时尚未入馆，而孔氏作序时，殿本将出矣。段氏之言是也。）孔刻《戴集》无《书〈水经注〉后》一文，段《谱》谓：‘昔年写得此本并《自记》一篇。’知此文为段氏据自藏写本增入者。”²¹

王重民所核查资料，对于胡适确定戴震校《水经注》时间应该大有帮助。

（2）所谓吴騫用赵一清《水经注释》过录柳大中本

此本未见胡适所列《水经注》版本目录。王重民1943年12月6日致信胡适，介绍了赵一清《水经注释》参考的重要《水经注》版本，后提到吴騫过录柳大中本：“赵一清所据重要本子，为赵琦美、何义门、孙潜夫三家。他从赵、何二家引见归有光本，从孙氏引见柳大中本。……吴騫校柳本于赵本上，亦因赵未直接见柳大中本。”据此，此本当为王重民介绍给胡适的。

胡适在1943年12月11日回复王重民的信中，指出此本的价值，并请王重民查看此本是否有题记：“吴騫所藏赵书（‘小山堂’抄本当然也很有考据之用。）若不被毁，应该可以使我们知道乾隆三十八年以前的赵本真相。吴騫若有题记，倘蒙抄寄全文，甚感。”²²1943年12月27日，胡适在给王重民书信的信后两度附记，请王重民抄录此本的跋文：“吴騫用赵氏《注释》来过录柳大中本，其原跋如何？乞抄示一读，至感。”“吴騫享高寿，当其晚年，赵书已刊行。当其死时（嘉庆十八）赵书已刊出二十七八年了。故我甚欲一读拜经楼《水经》诸跋，尤欲读此一跋。”²³足见胡适对此本的重视。

1943年12月30日，王重民请刘修业抄录吴騫跋文，他在当天给胡适的信中说：“今早内子录讫吴跋，重校一过，益觉重民前信所述，一误再

误，今呈先生读之，则前所述者俱废矣。此跋除记柳本外，似多同于《浙江采进总录》，吴騫殆在进书处抄得赵书者欤？”此信表明，王重民不仅帮助胡适抄录文本，而且与胡适有所讨论。

最后，胡适根据相关材料，对此本有一系列判断，他在1944年1月6日给王重民的信中说：“吴騫一跋，使我和你都得不少教训。他只‘录得赵本’，当亦不过‘过录’而已，未必有其书。一也。他确见赵书，则无可疑。此跋中所举各本子，皆依据赵书所举‘参校诸本’，可证。二也。（来示谓此跋与《浙进书录》多同，实不然。）吴跋说他所见是柳大中本，只是他‘定为从柳本传抄’，实‘不着大中姓氏’。无论如何，吴騫此本于我们今日重审戴、赵案无关，三也。吴跋因欲自诩其得见柳本，故谓赵东潜未睹柳本为遗憾。但赵氏所开诸本中实有柳本；谢山曾跋柳本，东潜得过录之，并不足奇。吴跋谓东潜未睹柳本，似无据，四也。……”²⁴至此，所谓吴騫用赵一清《水经注释》过录柳大中本被胡适断定与“赵戴水经注案”无关。即使如此，王重民提供的资料与与胡适的往来讨论对于胡适厘清《水经注》版本的一些问题还是有帮助的。

（3）关于聚珍版戴校《水经注》印书年月

1944年1月10日胡适致信王重民，信中说：“有二小点，敬乞一查，并乞示知，至感。（1）聚珍版戴校《水经注》有无刻书年月？（刻成在四十年，毫无问题。）……”²⁵

王重民对此问题的回复，《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不见收录。胡适1944年1月17日给王重民的复信开头说：“连接一月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各书，得益不可胜数。”²⁶胡适王重民纽约华盛顿之间书信一般一两天即可收到，因此王重民对胡适1月10日书信的回复应在胡适提到的“各书”中，可惜《书信集》上述“各书”中仅存1月15日一封，而内容与胡适1月10日的问题不相关涉。考虑此问题翻检原书即可回答，笔者推测王重民应该是做了答复的。

（4）关于杨氏《汇校》本所引沈大成校语
杨氏《汇校》本，指杨希閔《水经注汇校》。

1944年1月24日胡适致信王重民,希望借阅此本:“杨氏《汇校》,我当时忽略了,没借来。今读大札,知其全引沈大成校语,故极愿借读。托曹君带来不迟。”²⁷

王重民1月26日复信说:“不知曹君何日动身?明日Dubs来,或托伊将《汇校》等书带交王毓铨兄,再转先生。”²⁸

此“曹君”不知何许人,也许因为王重民找不到合适的人把书带去,胡适似乎有些着急,于是在2月1日再次写信给王重民,希望将书邮寄给自己:“若曹君一时不来,乞将书籍等件交邮寄来。我甚欲看杨希闵刻《汇校》。但不必急急。”²⁹

王重民接信后即将《汇校》寄出,同时附上不少参考资料。他在2月9日的复信中说:“曹君一时不去纽约,昨日已将杨氏汇校本,移录沈校本及《圣心》内所载岑仲勉校《水经注》卷一寄上。又附上岑校《佛游》、藤田校《五天竺》各一册,及《魏默深集》一部。《魏集》也许还藏有一些鬼影。”³⁰至此,此事圆满完成。

(5) 请代借黄省曾刻本《水经注》与北平图书馆藏别下斋藏本《水经注》

胡适1945年6月19日致信王重民:“如方便时,请代借黄省曾刻本《水经注》一用。你前年跋的那部别下斋藏本《水经注》,如有便人来,也请借给我一看。”³¹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中未见王重民对此信的回复。不过胡适是年10月4日给王重民的信中谈到为国会图书馆藏各本作短跋时,曾提到黄省曾本:“黄省曾本值得一篇好跋,好评。”³²据此,胡适似当借阅过此本。

(6) 借阅吴琯《水经注》刻本

此本即胡适《水经注》目录所列第4种,明万历十三年(1585)刻本。

胡适在1945年10月14日写给王重民的信中说:“馆中吴琯本已收到了。吴琯本甚重要,因为陆弼、吴琯是第一次校改黄省曾本,而不加校语,人多不知其校改之功。”³³此信说明之前胡适曾请王重民代为借阅邮寄此本。惜《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缺此前双方联系书信。

以上是王重民帮助胡适借阅、查阅《水经注》版本情况。王重民之外,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首任主任的恒慕义(A. W. Hummel)对胡适应该也有所帮助。恒慕义早年在中国期间,即与胡适有所交往,如他在1934年5月24日的日记中记有“A. W. Hummel来谈。”³⁴胡适要借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图书,必然要得到东方部主任恒慕义的同意。王重民1942年12月1日回复胡适关于借阅国会图书馆四种图书的书信时,所说“嘱借之书,已向Dr. Hummel说好”³⁵之语即是例证。

(二) 胡适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水经注》版本情况

胡适客居纽约,离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加之身为哥伦比亚著名校友,因此利用哥大藏书比较方便。从目前笔者了解的材料看,胡适对哥大藏书的利用或许是他本人直接联系、查阅,具体细节不详,仅能从他与王重民、杨联陞等人的通信中了解一些情况。

(1) 1943年11月30日借得哥大图书馆《水经注》版本四种

胡适1943年12月1日给王重民的信说:“昨日借得《经韵楼集》,赵氏《水经注释》及《朱笺刊误》(是光绪张刻本),及影印《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费了一日两夜之力,细细对勘,始知此案果是大冤枉。”³⁶此前胡适1943年11月18日致杨联陞信中说:“哥大的赵氏《水经注释》是光绪张翻本,哥大只有影本《永乐大典·水经注》,而无孔刻戴校《水经》。”³⁷所说两种《水经注》版本恰好为胡适给王重民的信中所说“昨日借得”的几种《水经注》版本当中的两种,加之胡适跟王重民说“昨日借得”,可以肯定不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借的。因此,笔者推断,此四种版本当为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借得,其中《经韵楼集》、《朱笺刊误》未列入胡适《水经注》目录,“赵氏《水经注释》”应指列第18种的光绪六年(1880)张寿荣刻本,影印《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则列书目第1种。

(2) 1943年12月5日借得哥大图书馆朱谋

璋《水经注笺》

1943年12月6日,胡适在写给王重民的信中不无喜悦地报告:“昨借得哥大所藏朱《笺》的是万历乙卯初刻初印本,令我惊喜。……其雕刻甚精,双行小字尤为工致可爱。朱《笺》板本,此为第一。”³⁸这里的“朱《笺》”,即名列胡适《水经注》书目第5种的朱谋璋《水经注笺》,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长庚刻本。

(3) 1945年6月30日借得哥大图书馆张匡学《水经注释地》

1945年7月1日,胡适致王重民的信中说:“昨天借得哥大藏的张匡学(歙县)的《水经注释地》两函(刻于嘉庆二三年,有曹文埴、袁枚的序),其书是用黄晟本‘今照依刊刻’,而在每叶上端用小字刊刻‘今府州县名’或‘音切’。此书没有价值。”³⁹既然没有价值,故胡适最后未列入《水经注》书目之中。

(三) 胡适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水经注》版本情况

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成立于1928年,在首任馆长裘开明的主持下,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中文馆藏发展很快。据《胡适日记全集》,胡适与裘开明至少在1933年就有交往。⁴⁰胡适借阅哈佛燕京的《水经注》版本,得到裘开明的大力支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水经注考证稿”中就收有裘开明给胡适的两封信。胡适关于《水经注》的一些文章,包括涉及哈佛藏本的跋文等,常寄给裘开明,以及当时在哈佛读书的杨联陞、周一良等人传阅。裘开明还曾主动为胡适提供相关书目、资料。如他在1943年12月22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所开十二种《水经注》板本,除万历原刻朱笺本及全校本未备外,其余均为哈佛所有。……其他《水经注》不知需用否?请示知。”⁴¹再如1945年10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尊稿拜读再三,无任钦佩。先生推定钟惺的《水经注钞》曾于明末刊行,尤见倬识,兹将关于此节之赵吉士的序言钞录如下,以证先生推论之确当:……”⁴²信中提到的“钟惺的《水经注钞》”,即胡适《在海外所用〈水经注〉本子简目》所列

第六种:清顺治十五年赵吉士重刻“三注钞”之钟惺《水经注钞》六卷。信中说胡适对哈佛藏此书的版本进行了推定,胡适曾参考过此书当无疑问。胡适在《水经注版本考:钟惺水经注钞六卷》一文中也曾提到此书的哈佛藏本:“此书万历原刻我未见,有顺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赵吉士翻刻本,哈佛大学藏一部,我藏一部。”⁴³

胡适利用哈佛燕京藏书,更多的是得到当时在哈佛读书的杨联陞的帮助。胡适与杨联陞的交往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余英时在为两人书信集《论学谈诗二十年》所做的序言中推测,两人至少在1943年2月14日应该已经认识。当天晚上胡适在赵元任家和一些中国学生长谈,杨是赵元任的得意弟子,应该与于其中。⁴⁴以下根据胡适与杨联陞的往来书信,略述胡适利用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水经注》版本情况。

1943年11月18日,胡适决定重审“《水经注》案”后不久,即写信把此事告诉了杨联陞。在杨联陞回信提供了一些相关研究文献信息之后,胡适于11月28日再度致信杨联陞,请他查一下哈佛是否有几种《水经注》版本:“哈佛馆中有无下列各书?(A) 赵一清《水经注释》的乾隆刻本。(若有此书,乞将第一册借我一观。)(我借到的本子,缺封面首页,缺毕序,缺《提要》上半。)(B) 朱谋璋的《水经注笺》哈佛有何版本?”⁴⁵

11月30日,杨联陞复信说:“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哈佛只有光绪重刻本,卷首有毕序。有一位先生用朱笔在上面根据戴本批校,可是只校了两本,我已经请裘闇辉先生把这两本寄给您了。朱谋璋的《水经注笺》,哈佛似乎没有。不过有一部乾隆十八年黄晟刻的《水经注》。王先谦在他的校本例略中说此书“前列欧阳玄、黄省曾、王世懋、朱谋璋、李长庚五序。自跋云,爰取旧本,重为校刊,而不著其何本。书中校语大氏与朱《笺》合,岂即赵所称耶。”我疑心黄刻所据,即是朱本。王先谦所用,大约也是此本。哈佛这一部,有一位自称“东遼氏”的先生用朱墨笔批校,似乎也是独立发现经注混淆的一位,他自称“余以两月之力方得其绪”,不过也只校了六卷,都在前两册

内。我也请裘先生寄给您了。”⁴⁶

12月11日,胡适回信说:“裘先生寄的黄晟刻《水经注》二本,及张刻赵氏《水经注释》二本,都收到了,谢谢。黄晟本全翻项綌本,只删去目录后项氏一跋,而加入黄晟自跋一篇,此外丝毫无改项氏款式。……但哈佛大学此本(黄晟本)有一个奇特现象,就使此本成为一件宝贝了!此本首两册的校语乃是一位不知名的学者过录戴东原早期校《水经注》的校语!‘东遄氏’即东原氏。”⁴⁷对于戴震早期校语的不经意发现,胡适可谓大喜过望,他在此日信中还说:“请告裘先生,让他高兴高兴。”⁴⁸由此也可知,胡适所借哈佛黄晟刻《水经注》,即胡适目录中所列第20种,戴震早年校水经注残本(题“东遄氏”,过录于黄晟刻本)。而“张刻赵氏《水经注释》”,即胡适目录中的第18种,张寿荣光绪六年(1880)刻本赵一清《水经注释》。

(四) 胡适利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水经注》版本情况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Gest Library)的藏书原属美国人葛思德的个人收藏,193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向葛思德购买这批藏书,交普林斯顿大学保存。

大约胡适重审“《水经注》案”之前三个月,胡适曾向裘开明了解葛思德图书馆的情况。裘开明在1943年8月6日回复胡适的信中有“承询对Gest Library意见”等语,并随后对该馆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达六页之多。⁴⁹

胡适对葛思德图书馆藏书的利用,主要是靠尤桐代为办理。尤桐此时留学于普林斯顿大学。尤桐1944年1月7日给胡适的信中开头说:“上回到纽约去,会到了好多朋友,快慰的很。”⁵⁰北京大学图书馆胡适的藏书中有—册胡适抗战期间在美的生日纪念册,在1943年12月17日给胡适祝寿的签名中,有尤桐的名字。因此,信中说的“上回到纽约去”,应该指此次祝寿会。此时胡适刚开始重审“《水经注》案”不久,尤桐来自普林斯顿,必然请他帮忙。尤桐在信中说:“您所说的关于《水经注》版本的事,我已经查过了。这边

图书馆没有元代刻本,所有的就是这几种本子:……”此后列出八种《水经注》版本。并说:“其中您喜欢参考那一种,我可以给您寄去。此外若有什么要查或要钞的东西,请告诉我,我可以代您做。”⁵¹

此后进展如何,现公布的胡适与尤桐的书信中并没有相关信息,倒是胡适与王重民的书信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1944年1月8日,也就是尤桐报告胡适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水经注》版本情况的第二天,胡适收到尤桐来信,并在当天给王重民的信中说:“顷得尤桐兄书,知Princeton有一部赵书,是‘甘泉岑氏惧盈斋《四库》抄本’,不知所谓‘四库抄本’是何物,已去信借观了。”⁵²1月18日,胡适在给王重民的信中说:“今天下午,尤君亲送岑抄库本赵书二十大册来,又会稽章氏光绪六年刻赵书全部,”⁵³胡适1944年2月25日给王重民的信中又说:“会稽章氏光绪庚辰刻了一部《水经》丛书,而无总名。其中收的是:

赵一清 《水经注释》

孔继涵 《水经释地》

董祐诚 《水经注图说残稿》

黄宗羲 《今水经》

我从Princeton借得此书,曾看了孔氏书。此书无序跋,但似是依据戴东原更定的《水经》而加注的。”⁵⁴

结合两信可知,胡适所借“会稽章氏光绪六年刻赵书全部”,包括胡适所列书目中第19种和23种,而“岑抄库本赵书”,即胡适《在海外所用〈水经注〉本子简目》所列第15种。胡适参考葛思德图书馆藏《水经注》版本共此三种。

(五) 胡适利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水经注》版本情况

胡适利用的美国各大图书馆中,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离纽约最远,胡适利用的时间也最晚。

1944年3月22日,胡适在给王重民的信中说:“我廿九日去芝加哥看看他们的藏书,顺带为邓嗣禹的兵官学校作六个讲演。”⁵⁵4月8日,胡适致信王重民,介绍了当天查阅芝加哥藏书的情况和

感想：“今天上午去看芝大藏的中国书，颇惊其种类册数之多，可称此邦第四（或四、五之间？）（尚未全见其新得之 Newborn Collection）。《水经注》有赵、戴、全《合校》、《汇校》、《朱笺》。其中之赵氏书乃是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本！我已借出细看，当为作一短跋。先写此短信，报告此好消息。”⁵⁶4月16日，胡适在给王重民的信中修正了自己对赵氏《水经注释》版本的认识：“芝加哥的赵书，是五十一年刻成后经过第一次修改的本子。昨日以一日夜之力细校之，始得此结论。”⁵⁷此本即胡适书目所列第16种“初刻初修本”。

胡适能借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此本，是得到了邓嗣禹的帮助。胡适此次去芝加哥之前，并不认识邓嗣禹。他在1944年4月26日给邓嗣禹的信中说，此次芝城之游，“最大的愉快是认识了你和许多新朋友。”⁵⁸邓嗣禹1942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到芝加哥任教。据《裘开明年谱》，邓嗣禹至晚在1942年7月已经代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⁵⁹馆长，至少到1945年8月仍代理该职。⁶⁰故笔者推测，胡适访问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期间，邓嗣禹应仍代理远东图书馆馆长，为胡适参观该馆藏书，了解所藏《水经注》版本，以及借阅赵一清《水经注释》提供了很多便利。194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曾请邓嗣禹到北大任教一年，此是后话。

至于当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情况，该校教授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41年7月7日给裘开明的信中提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有100000册中文书”⁶¹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胡适“颇惊其种类册数之多”。

三. 胡适为美国各大图书馆藏《水经注》版本所作的跋文

胡适1945年10月4日写给王重民的信中说：“我将来必为国会所藏诸本各作一短跋。”⁶²实际上，胡适对于所利用的美国五大图书馆的重要《水经注》版本都写有跋文。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的“水经注考证稿”部分，胡适撰写的相关跋文有：

（1）1943年12月13日，《记哈佛大学藏的

水经注所过录的戴东原校改残本》（手稿影印件）

（2）1944年1月3日，《跋项綱刻本水经注》（手稿影印件），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

（3）1944年1月4日，《跋哈佛大学藏的过录戴东原校水经注残本》（下）

（4）1944年1月24日，《再跋哈佛大学的过录戴东原校水经注残本》（手稿影印件）

（5）1944年2月23日，《再记项綱本》，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

（6）1944年4月15日，《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氏水经注释》。

（7）1944年5月19日，《记何焯的水经校本》，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杨希闵《水经注释汇校》之过录本。

（8）1944年5月21日，《记沈大成的水经校本》，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杨希闵《水经注释汇校》之过录本。

（9）1945年12月13日，《跋岑氏慎盈斋钞四库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抄稿），此为葛思德图书馆藏本。

（10）1945年12月13日，《跋章寿康刻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抄稿），此为葛思德图书馆藏本。

（11）1945年7月9日，《三跋项綱本》，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

（12）1945年9月26日，《锺惺的水经注钞六卷》及《后记》，此为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藏本。

（13）1945年12月23日，《跋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朱谋埠〈水经笺注〉》（手稿影印件）

（14）1946年4月2日，《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一清水经注释》（手稿影印件）

上列各跋后之“手稿影印件”、“抄本”说明，均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相关目录，笔者查阅之后，发现凡标有“手稿影印件”、“抄本”者，确非胡适手稿原件。笔者有幸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一睹胡适留赠哈佛的《记哈佛大学藏的水经注所过录的戴东原校改残本》及《再跋哈佛大学的过录戴东原校水经注残本》墨宝。由此进而推测，以上所列标明“手稿影印件”、“抄本”的胡

适“短跋”原件应该都赠与了所讨论《水经注》版本的各收藏馆。就笔者所知的材料，尚有一例可证，那就是胡适1946年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所藏赵一清《水经注释》所写的跋文。胡适在此跋的前页留下题记：“前年承芝加哥大学邓嗣禹先生代我借得此本，一借就快满两年了。敬寄此跋，赠与芝加哥大学汉文图书部。胡适，一九四六，四，二。”⁶³此时胡适即将归国，将此书归还，并寄赠一跋。此跋原件多年后为国内学者再度揭示。1982年4月，吴晓铃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访问，在东亚图书馆查阅古籍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于是在时任该馆图书馆主任郑炯文先生和采编部主任马泰来先生的帮助下，看到了胡适手稿原件，复制了一份，并写成“书胡适《跋芝加哥大学藏得赵一清〈水经注释〉》后”一文。⁶⁴

至于其他各馆情况，暂无文献资料可供参考。笔者希望有机会做一调查。胡适将“短跋”分赠美国各大图书馆，除了表示谢意外，也许还有“藏诸名山”的深意？

四. 后记

拙文初稿草成于2013年6月底，其时距胡适重审“《水经注》案”七十周年只有不到四个月了。七十年前，抗战的烽火尚未平息，胡适能够在海外静坐书斋，潜心研究，确属不易。还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非常欣赏歌德“每遇政界有大事震荡心目，则黽勉致力于一种绝不相关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的做法，此后又多次提及。此时的《水经注》研究不知是否为胡适的一次具体践履。胡适的《水经注》考证的动机，至今众说纷纭，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被多数研究者看好。笔者之所以不惮烦劳，梳理种种往事，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了解一位名学者在身边没有多少藏书的情况下是如何利用图书馆的，他的名气和人脉对他的帮助有多少。此外，美国各大图书馆的服务精神，王重民、杨联陞、裘开明、邓嗣禹等学者对胡适研究提供的无私的资料和学术支持，对我们今天或许仍有借鉴的价值；其二，笔者有

幸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学习交流，第一次如此接近胡适研究《水经注》的海外环境，今年又恰逢胡适重审“《水经注》案”七十年，希望能够追寻胡适当年的研究踪迹，做小小的考察，以为纪念。

2013年11月4日至8日，笔者与两位同行参观了美东几大著名图书馆，得以利用此难得机会对胡适利用各馆《水经注》版本和相关跋文去向等问题做实地调查。凑巧的是，11月8日，笔者访问各馆的最后一天，恰好是胡适重审“《水经注》案”七十周年。对于笔者来说，此行可谓颇具纪念意义。

11月5日，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王成志先生热情接待，笔者查阅了该馆所藏朱谋㙔《水经注笺》，并得见胡适为此书所写跋文手稿原件。手稿就保存在该书函套所附的信封内。

11月7日，我们访问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此次美东图书馆之行出发前，笔者在网上检索了普大藏书目录，检索到岑氏慎斋钞四库本赵一清《水经注释》，该目录明确注明附有胡适的跋。承东亚馆马泰来馆长、何义壮博士关照，在我们拜访之前，该书已被调至东亚馆。（东亚馆的善本现均藏于普林斯顿档案馆。）于是笔者得以翻阅胡适当年研究过的《水经注》版本，并证实该书函套中确实夹有胡适的跋文。只是此手稿非胡适亲笔，而是尤桐抄录。笔者后来将该抄件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的抄件相对照，发现二者笔迹相同，但有两处不同：（一）普大抄件末有“尤桐抄写”四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收抄件则无；（二）普大抄件第一、五、七页有胡适题记、修改各一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收抄件则无。

至于胡适参考的普大另一种《水经注》版本——章寿康刻赵一清《水经注释》，由何义壮博士帮助在卡片目录中查到。经查此书存于普大远程书库，所以我们当天来不及看到了。笔者回到波士顿之后，承何博士赐告，该版本也附有胡适的跋文，同样是尤桐抄录的。笔者将何博士发来的扫描件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录的抄件两

相对照，二者笔迹仍然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文末有“尤桐抄写”四字，后者则无。

11月8日下午，我们三人访问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宋玉武博士为我们介绍国会图书馆之余，也准备了笔者所希望查阅的该馆项纲刻本《水经注》。遗憾的是，在该书中没有发现胡适的跋文。笔者注意到，此书的索书号注明为“Copy 3”，因此推测，国会图书馆所藏项纲刻本《水经注》至少有三套，胡适留下的跋文，或许存于其他“Copy”之中。

此次美东参观，有赖各馆诸位先生的热心接待帮助，笔者得以亲见胡适当年研究过的几种《水经注》版本及相关跋文，进一步证实了拙文关于胡适将为各馆撰写的跋文分赠各馆的推测。与笔者所预想不同者，普大的胡适跋文均为尤桐抄件，而非胡适手稿原件。经过比对，一个小小的发现是，胡适带回国内，后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关于普大《水经注》版本的两篇跋文，均为尤桐抄录。至于胡适此两篇跋文的原文现存何处，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1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184页。

2胡适：《自述治水经注案缘起及论述片断》，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一册，黄山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3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4《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40页。

5《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425页。

6《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426页。

7胡适：《〈水经注〉版本目录》，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册，第465-470页。

8《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54页。

9《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54页。

10《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77页。

11胡适：《自述治水经注案缘起及论述片断》，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一册，第10页。

12胡适，杨联陞著，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7页。

13《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36页。

14《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42页。

15胡适，杨联陞著，《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7页。

16胡适，杨联陞著，《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10页。

17《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4页。

18《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4页。

19《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6页。

20《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25页。

21《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32页。其中“孔、段所刻《戴集》内《水经》郦道元注序文字相同”一句，原书标点作“孔、段所刻《戴集》内《水经》，郦道元注、序文字相同”，似有误，据文意改。

22《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57页。

23《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66页。

24《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74页。

25《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82页。

26《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87页。

27《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03页。

28《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04页。

29《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11页。

30《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15页。

31《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289页。

32《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425页。

33《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425页。

34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118页。

35《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8页。

36《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38页。

37胡适，杨联陞著：《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7页。

38《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51页。

39《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395页。

40胡适1934年3月9日日记：“去年我在《国闻》四十四期上见张佛泉先生一文，曾到处揄扬他，且写信到哈佛托裘开明打听此人。”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2页。

41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册，352页。

42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册，123页。

43此文收入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馆藏号：HS-MS01-011-007。

44余英时：《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载胡适，杨联陞著，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3页。

45胡适，杨联陞著，《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10页。

46胡适，杨联陞著，《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12页。

47胡适，杨联陞著，《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13页。

48胡适，杨联陞著，《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14页。

49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345-351页。

50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第572页。

51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第572页。

52《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80页。

53《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195页。

54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 229 页。
55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 253 页。
56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 277 页。
57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 285 页。
58 胡适著，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5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74 页。
59 胡适称为“芝加哥大学汉文图书部”，此或为翻译的不同。
60 参见 1942 年 7 月 14 日，邓嗣禹致裘开明；1945 年 8 月

27 日邓嗣禹致裘开明。以上两信收入程焕文编：《裘开明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80 页，318 页，
61 程焕文编：《裘开明年谱》，第 263 页。
62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 425 页。
63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 册，第 53 页。
64 吴晓铃：《书胡适〈跋芝加哥大学藏得赵一清水经注释后〉》，载《文献》，1983 年第 1 期，第 14-15 页。

從胡適的一封信看傅斯年苦心經營臺灣大學之例

劉廣定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胡適先生有一信從美國寄給臺灣大學的傅斯年校長，說明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通過給臺大七個赴美進修的名額。此信披露於四月三日出版的《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 62 期。六十四年來，似未獲胡適研究者、傅斯年研究者、中基會研究者或臺大校史研究者的重視。信的內容如下：

孟真兄：

三月八日得電報，匆匆覆一電云：7 Taita Fellowship voted Letter Follows，但因大會紀錄沒有整理，沒有經孟鄰兄看過，故未能即寫信。乞恕之。

此次開的是 Special meeting，但因詠霓不來，幾乎開不成會。後來幸得司徒大使醫院的許可，我們到醫院去開了五分鐘的會，法定人數足夠了，舉出梅貽琦來繼任傅斯年。此案通過後，我們約了梅君同到中國大使館去繼續開會。（司徒兩月來大有起色，已能說話了，故可以算作一個能用他的官能，能負責的董事。但醫院病房不能久留多人，故我們不能不把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滿任的缺額請一位能到會的月涵兄補上。此意千萬請老兄原諒。）

臺大的請求，我們都同情。但前年動用基金作為三釐半年息的投資，此計劃完全失敗了，只有北大把借款十萬元全數歸還，其餘十五萬元，本息皆無落。故此次會議，無人能重提借用基金之議，只能就中基會

income 之內，提出足夠每年七個 Fellowship 的款數，為國立臺大選送教員與畢業生至美國進修之用，暫定兩年，每年暫定美金兩萬元，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開始。原案有一句話：「...than, as the purpose was to give to the university 7 Fellowship each year for two year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empowered to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s in the payment of the amount appropriated.」。這就是說，每年以七個 Fellowships 為限，但如每年兩萬元之數如稍有不足之處，執行委員會有權可與臺大商酌，量為補足。

會議完後，我因代任叔永作 Director，故須對臺大事作一補充細則。我與夢鄰月涵二兄細商，覺得你信中所擬比清華教員留美待遇（每人總數 \$3,000 學費旅費在內）及清華留學生待遇（月費 \$125，旅費來往共 \$800，學費每年超出 \$200 之數則由清華擔負）皆太寬。故我們擬出臺大選送赴美進修試行辦法如下，請你與臺大同人商酌後見覆。

(1) 無論教員或畢業生，其學費(Tuition)均由中基會代付。

(2) 教員與畢業生川資均定每人來往合計美金一千四百元(\$1,400.00)。

(3) 教員出國進修，一年為限。每年送四人，則兩年可送八人。每年送五人，則兩年可送十人。其留美期間，每人以十個月計，每月 \$175.00。

(4) 畢業生出國進修，每人以兩年為限。

其留美時期，每人以二十一個月計算，每月費為 \$100.00。

(5) 如此辦法，則每一教員出國，須有川資來往 \$ 1,400.00

十個月月月費共計 \$ 1,750.00

共合 \$ 3,150.00

若每年四人：\$ 12,600.00

兩年八人：\$ 25,200.00

若每年五人：\$ 15,750.00

兩年十人：\$ 31,500.00

(6) 如此辦法，則每一畢業生出國，須有川資來往 \$ 1,400.00

廿二個月月月費 \$ 3,300.00

共計 \$ 4,700.00

若送兩人二年共 \$ 9,400.00

若送三人二年共 \$ 14,100.00

(7) 請臺大速決定下列兩辦法之一：

(甲) 每年送教員五人，畢業生二人？

或(乙) 每年送教員四人，畢業生三人？、

若臺大採(甲)法，則

教員五人，第一年 \$ 15,750

又五人，第二年 \$ 15,750

畢業生二人留兩年 \$ 9,400

兩年共計 \$ 40,900

若臺大採(乙)法，則

教員四人，第一年 \$ 12,600

又四人，第二年 \$ 12,600

畢業生三人留兩年 \$ 14,100

兩年共計 \$ 39,300

學費各大學不一致，清華之法似太刻，容易驅人選擇學費最廉的大學。故我們決定由 China Foundation 擔負 Tuition 每年平均以三千元至四千元計，故每年超出兩萬元之數略等于 Tuition 之費用，此數可由 Executive Committee 酌量撥付。此即議案中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empowered to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s 之用意。故此兩年試辦期中，中基會擔負臺大 Fellowship 七個，每年約數為兩萬三千元至兩萬四千元。

請早日決定，早日選人，因護照與入學准許都需時間。選人全權在臺大，但千萬請注重英語與英文。

弟胡適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 62 期，39 年 4 月 3 日]
先說明兩點：

(一) 所謂「中基會」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之簡稱，成立於 1924 年 9 月，由中美董事十五人組成，其中美國董事佔三分之一，負責接收與保管美國第二次退還的庚款餘數，使用該款於促進中國教育及文化事業。其範圍主要在科學教育、科學研究、科學應用、以及屬於永久性質的文化事業(如圖書館)等方面。對於 1949 年前我國科學事業之發展有重大影響。

(二) 所謂「前年的投資計畫完全失敗」是指 1947 年 12 月的第二十次董事年會，通過了一項貸款專案，撥出至多二十五萬美元，分別貸予不超過四個國立大學，以為添置理科学研究及教學設備之用。1948 年 7 月執行委員會核定的貸款為：北京大學十萬美元，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各五萬美元。但由於政局發生劇變，計畫成為泡影。北大的十萬美元原已全交吳大猷在美國採購「現代物理」儀器以從事原子核實驗，但 1949 年 2 月吳先生即將該款歸還中基會。後來中央大學周鴻經校長也還了未用的三萬多美元。(1962 年 2 月 5 日《胡適日記》)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胡先生之熱誠與愛護朋友，不但為台灣大學爭取赴美進修經費，還代百忙中的傅斯年校長做了初步的規劃。傅校長得信後隨即迅速辦理中基會資助台灣大學教員育與畢業學生赴美進修一事，4 月 25 日向全校提出報告，載：《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 66 期(39 年 5 月 1 日)
傅校長對辦理本年中基會資助本校教員出國進修事之報告

請求中基會研究額赴美進修一事，業經審查決定，茲將審查經過及決定報告如下：

辦理此事申請之時間較短，本月二十日下午截止後，即于當晚開審查會，由行政會議全體出席人（列席除外）組織之。其所以如此匆迫者，因向美找適宜學校並非易事（此時不收或少收外國人員研究者為多）尤費時間，護照手續亦然。兼以至遲須八月中旬上船，故此時辦理此事，已嫌其晚。（去年辦同類事甚晚，以至上一學期大部犧牲，故此事及考畢業生一事均須速辦。）

此次申請者甚多，頗出斯年等意料之外，蓋本校以前辦理同樣之事，常有學校請其去而不去者，未料及此次如此踴躍，誠然前者範圍及辦法與此皆有不同之處。申請之前未盡料及申請後所生之問題，故申請前所公布之範圍，今知其過于廣泛及不定，若干問題待申請後出來，不得不逐一討論解決之。

今雖有甚多問題出來，然原宣布之辦法，既已宣布，在精神及文字上亦皆須遵守，乃有下列之考慮。

（一）原宣布自教授至助教凡服務滿一年者皆可申請之，于是地位及年資遂不能為標準。蓋如以地位為標準，通過者勢必以教授為限（至多副教授），然則講師助教亦可申請者又何為乎？如以年資為標準，則又何必僅定一年乎？審查之結果，教授一人，副教授一人，講師二人，助教一人，似為平均平配，此固由于開審查會時多數同人有「年青人頗值得考慮，然亦不必專以年輕者為限」之見解，然大意亦含于原宣布辦法之中也。助教與教授，無法比較其學問，故原宣布之辦法實與教授七年休假之部章毫無相類之處，而含有鼓勵後進工作者之意。

（二）原宣布臺灣省籍之意，乃因祖國人士自抗戰以來，出國進修之機會多得多（此就一般言，個人自各有不同），而臺籍同人獨少，此為不可忽略者。且本校辦理此事，並無泛泛為國家培植人才之公心，乃是單獨為臺大培植教員之私意。臺籍人士大體說來，將來留臺大之可能性較多，今如一視同仁，猶之以同一國文英文之標準責之于中學生，恰如莊子所謂「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今審查結果，臺灣省籍四人，非臺籍者一人，後

者之數為一為二，純為偶然。

以上兩事，原文雖未定明，其義實含于原宣布之中也。

新出之問題，第一項即為系主任。目下本校若干系教授甚少，舉辦此事本為充實教學，若因系主任公出一年而系務大生影響，乃至無法辦理，則將來雖有所得，目下先不得了。涉及之各系情形雖不盡同，然欲于一月之內解決此問題，則涉及之各系皆做不到。本校亦有時系主任虛懸一時者，然此等現象正補救之不暇，不可再由行政人員製造之。故考慮結果，無記名投票一致主張此次系主任不列入。此純為下學年各院教務之行政計，不特不含有薄待系主任之意，且以為系主任實多術明行修之學人，兼以服務之勞，值得最先考慮者也。今作此決定，出于今年之不得已，至乞諒宥者也。

次為一系缺少教員之困難。例如數學系，今年在系內及在一年級已大感人數不敷，兼以有兩位同事已自在美找到一事，暑假中離此。目下請教員在理農工等科者，真正困難之至，故為此事，理學院及斯年正在焦愁，若再送人走，誠為不了，故今年亦未列入，此乃原則，不關人選者也。

又次為科目之主要性。此實無法判斷者，一科既同在大學，即有其同等之重要性。惟本校建設正在發軌，凡一科目，學生人數多，專習教員人數少，或為本校所奇缺，或為一院一系一般進步所必需，自不免從先考慮。

又次為醫學院問題。斯年在審查會中曾說：醫學院至今已以他法送出者較多，或謂此次可不列入，同時亦有人謂醫學院全部臺籍教員人數等于其他五院臺籍教員人數之總數，應不剔除。關于此點，投票前未有決定。

審查會中對各項問題（上列，及以外之小問題）交換意見，先由各院長提出一數倍之名單，然後就其中草選出五人，選出後再投一次票，看是對草投票肯定或否定，第二次投票結果（兩次均不記名投票），七票認可，一票否定，遂以此結果報告正式行政會議。

四月二十二日第九十七次行政會議決定接受

此報告，其名單如下：

胡昌熾先生	教授	農學院園藝系	六票
林天祐先生	副教授	醫學院外科	五票
林渭川先生	講師	理學院化學系	八票
陳秩宗先生	講師	工學院化工系	七票
楊思標先生	助教	醫學院內科	四票
其餘一至三票不等。			

（附注）行政會議之決定，經常不投票。遇有重大事，討論不易得一致之同意時方舉行無記名投票。依大學法，三長六院長各一票，列席者不投票，校長在票數相等時投決定票。

四月二十日審查會後，二十二日第九十七次行政會議之前，校長教務長及外文系一位美國同事與上列四位臺籍同事以英語交談，並以其印象報告于第九十七次行政會議。故第九十七次行政會議決定接受此報告，確定人選案。同時決定儘放洋之前為其中幾位補習英文之口語。

關於英文英語之重視，有兩種理由：（一）此為原贈送者之意見。（二）此點實為切要，蓋在美期限甚短，如口語不甚嫻熟，受限甚多。今辦理此事，于此點並非苛求，但求于事有濟而已。故第九十七次行政會議有附帶關於英語之一決定。

此點在本屆未盡合理想，亦尚可補救。下屆辦理此事，（即明年之五人）當于今年年底以前決定，庶幾更易補救。又加上文系主任一說，亦當放棄，因半年前決定之事，人事上有法處理也。又如其他辦法包括籍貫比例在內，亦可有重大之變更。俗語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今辦此事之經驗，甚有助于將來辦此類事。

此一結果，未能認為盡合理想。然所以致此者，大略有三原因：（一）時間過于匆迫，故成「急就章」。（二）想到之原則過于多，故綜合之後，反無其決定性之單純原則。（三）範圍過于廣泛，故推選上更為不易。然有一事敢斷言者，即決定之結果與原宣布之辦法在精神及文字上並無差異也。又有一事宜聲明者，即未推到之人，絕非不如已推到之人，乃受上文所述種種考慮之限制，又為投票之結果也。

傅斯年 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由傅校長之報告可見其執事效率之高，考慮之詳，尤其是優予錄取台灣省籍教師與畢業生，更見他為台灣大學培育人才之用心。五位教員中除胡昌熾教授（原金陵大學園藝系系主任）為江蘇人，其他四位都是台灣省人。畢業生則限定台灣省籍，5月11日錄取了葉瑞津和鄭建炎兩位。

胡先生的信裡又提及1950年中基會為達法定董事人數而須到海軍醫院司徒雷登病房開會一事，實與傅斯年校長未能赴美出席有關。按，中基會1947年選出董事為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霍布金斯(Paul S. Hopkins)、瑞德(J. T. S. Reed)、布拉第(Donald M. Brodie)、赫契生(C. R. Hutchison)霍寶樹、蔣廷黻、任鴻雋、蔣夢麟、胡適、傅斯年、周貽春、翁文灝、貝祖詒與孫科。1950年初任鴻雋在大陸，周貽春在香港，翁文灝與孫科在歐洲，蔣夢麟與傅斯年在台灣，貝祖詒、瑞德與司徒雷登有病。3月7日，蔣夢麟自台灣飛往美國，與霍布金斯、布拉第、赫契生、霍寶樹、蔣夢麟、胡適七人於華盛頓海軍醫院(Bethesda Navy Hospital)會同司徒雷登湊足法定人數後，又至中國大使館召集特別會議。補選新任董事梅貽琦、麥凱(James A. Mackay)接替傅斯年與瑞德。停頓一年多的中基會業務才恢復運作，也才得通過對台灣大學提供為期二年的學術獎助金案。(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中央研究院，1991)如果傅斯年校長也去美國，整個過程就會簡單的多。他為何不去呢？

傅校長因認真辦學，而招致許多人的不滿。一類人是因他1949年4月16日台灣大學三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制定了「國立台灣大學教員聘任及升級標準」，以頗為嚴格的聘任條件將那些沒有真才實學或仕學兩棲者摒於台大校門之外者。按，當時台濟大學不少系科缺少適任教師，亟待更換及增聘。傅斯年初到時雖已聘了一些大陸的知名學者，但因學生人數大增而師資仍遠為不足。另一方面，那時想要到台大任教的人却也不少：有些黨政人士擬轉任教職或在台灣大學兼任教職，另有一些原在大陸上其他大學任教因隨

政府遷移而到台灣的教授，還有些積極反共者，想憑藉政治資本進入台灣大學。但皆因傅校長把持聘任原則而未能遂願。又有一些原已在台灣大學任教，但不合格或不敬業者因傅校長採取強硬措施，而遭裁汰。

另一類人是有些黨政軍界人士及本省紳商過去常干擾校務，致使台灣大學教學管理與秩序十分混亂，入學轉學可藉人情說項。傅斯年到台大以後，首先從嚴格招生考試入手，繼而強化教學管理，制定嚴格規章制度並確實執行。因此，台灣大學教務工作很快走上正軌，新來及舊有之特權人士未能繼續得逞，而心懷不忿。

再者，傅斯年於 1949 年在共黨製造之學生事件發生後盡力保護學生，時任台灣警備司令的彭孟緝曾多次對傅夫人說，傅校長「曾向他提出三個條件：第一、速辦速決，第二、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第三，被捕的臺大學生，先送法院，受冤者，儘快釋放。」（俞大綵著「憶孟真」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頁 233-247，聯經出版公司，1980 年）由於得到省主席陳誠支持，無證據不得逮捕台大教職員生，也引起情治相關人士對傅校長有所不滿。

臺灣大學 1950 年慶祝元旦的晚會中有學生鬧事，指責演出的「嘉戎酒會」歌舞是共產黨提倡的「秧歌」，之後又在校內外作不實之宣傳，攻訐校方。但傅校長認為「嘉戎酒會」是當時教育部仍列為合法的音樂舞蹈教材，並不違法。乃將誣告生事又不悔過的學生開除。因此傅校長遭受素不滿意者之公開攻訐，也有人造謠說他將棄職赴美，引起學生的恐慌。一月十九日學生會與許多社團聯合致函挽留，信的全文為：

校長鈞鑒：

此次本校因同樂晚會而引起意外之謠言，全校同學莫不衷心關切，又為此事增加校長之煩勞，生等更為之不安。顧事實勝於雄辯，是非自有公論，其心懷叵測者又豈能動搖本校之風紀？乃近日來外間頗多謠傳，甚至有謂校長懷倦勤之意、生等明知此為無根之言，然亦不免惶恐！我校長以學術權威，來主本校，排

除萬難，苦心擘劃、應興應革。莫不全力以赴，而學風純正，尤向所未有。不僅生等愛戴莫名，亦社會人士所共仰；是今日之本校，非我校長不足以竟其功。想我校長平日化育人才，倡導學術。當不致為流言所動。生等尤願在鈞長領導之下，除安心向學外，並協助學校為安定與進步而努力。

專此 敬頌

鈞安

元、十九

全校學生團體同敬叩

此信原載《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五十五期（一月三十日出版），有 32 個學生團體具名，茲從略。

傅斯年則公開發表〈臺灣大學安定如常〉一文，說明臺大依法處理此事件之詳細經過，全文載於一月二十二日《新生報》。並在《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五十五期發布「給同事同學的公開信」如下：

諸位同事先生及同學：

近日校外校內傳言斯年將去國，將辭職，同事同學頻來問訊，敬聲明如下：

一、我之身體雖壞（久患血壓高），然久病之後轉不以為念。絕無于此困難之時，捨同事同學他去之理。

二、去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在美開會，須國內去人方足法定人數，故曾來電約去，期為二月八日。斯年以為此時去開會，必有謠言。明知有此一行，或可為臺大募幾許錢，然權衡輕重，仍不去，故當時立即電復不去（來往信件均在陳秘書渝生處，願看者可自由取閱）。

三、半年多，校外攻擊斯年者，實不無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為其殖民地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學為何物，故如遂其志，實陷本校于崩潰。鑒於一年來同事同學對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難之時，決不辭職，決不遷就，決加倍努力，為爭校之進步而奮鬥（下次校刊中登出此事有關文件）。

傅斯年 一月二十三日

信中說明不去美國開會的原因，也由此可見他苦心辦學、經營臺大之一斑。該期《校刊》還有一封教育部杭立武部長為台大元旦晚會事致傅校長之函。錄之以結拙文。

孟真校長吾兄大鑒：奉十九日

惠函附台大行政會議記錄一份，備悉台大元旦晚會情形，另一附件尤詳述當時及事後之經過，為以前各項報告所未及，根據此各種文件，元旦晚會有扭秧歌之傳言可以廓清；當即向各有關機關解釋說明，請其對於此事告一

段落。近台大行政會議所通過關稅今後維持「甯靜與進步」三項辦法甚為妥善，今後尤可防止學校之不安也。

專此順頌

教授

弟 杭立武拜啟 元月廿一日

（作者系台湾大学化学系荣誉教授）

林损与胡适 ——林损辞职事件评述

朱洪涛

林损（1891—1940）字公铎，浙江瑞安人，是永嘉学派最后一位传人。其著作有《政理古微》、《比较学》、《伦理正名论》、《老子口义》、《永嘉学派通论》、《永嘉学派述》、《文章学绪言》、《文心雕龙讲义》、《中国文学讲授发端》、《叔苴阁诗录》、《叔苴阁文录》以及杂著、碑传哀祭、信函、家书等文字，曾在吴宓主编的《学衡》上发表文章多篇。他的著作行世不多，学术影响也不大，有的甚至还散佚了，其著作全部结集出版是 2010 年的事情。林损进入公众视野是胡适在日记中对他离职北大的记叙。对胡适与林损去职事件的考辨，学界已有论述，然或偏重一方，或参杂情绪，反使此事件更令人感到扑朔迷离。本文以 2010 年出版的《林损集》及相关材料为基础，对该事件作一论述。

一

林损执教北大始于 1914 年，前后达二十年。在任教期间林损经常遇到的烦心事是薪水拖欠以致无力养家，这种情形一直到 1934 年他离职北大为止。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三》中有记：“林公铎爱喝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便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廉价的劣质的酒。黄季刚得知了大不以

为然，曾当面对林公铎说道：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这一次算是他对友人的地道的忠告。”¹周作人的这段回忆似乎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读者：学校欠薪、家事难办使林损借酒浇愁。陈西滢在《苦力问题》中说：“我来北京之先，有一个亲戚劝我不要到北京，就是到了北京也不要做教书匠。他说：‘我在报上看见北京的教员有的穷到晚上拉街车。’”²薪水不能按时发出导致“此间小学教员以饘粥不济，暗究苦者不尠，日则仍执教鞭，夜辄出拉洋车，损曾四遇其人”³。

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常使林损穷于应付。吴宓 1926 年 7 月 23 日记，“谈次知林君以经济困难，将于日内送眷南归温州瑞安原籍。”吴宓还记载林损因经济困难与他合租住房并多次向他借款。林损在 1926 年 11 月 13 日家信诉说自己生计窘迫：“寓中初购煤米，尚能为十日之谋，近则午餐方终，夕餐告乏，夕餐甫毕，早餐待筹，一味之营，动费奔走，一衣之赎，徒系梦思。一时之间，遽措洋六十元，实无以堪之。校中每月发薪，未尝有一次在五十元之上，一也；全寓每月开支须亏空百余元，告贷无门，二也；负债累累，前款未清，不敢启齿，三也。北京寒冻若此，而损犹仅棉衣一袭，往来校序之间，措颜于酒以鼓其不可一世之气，或以为俭，或以为名士之习，岂知其

穷困至于此极乎？”⁴此中林损提到囊中羞涩想向人借钱却不好意思再启齿，辛酸地指出了自己的处境。左支右绌的经济状态与沉重的家族负担缠绕着林损，让其有难以措手之感。他在1929年家信中倾吐亲戚过多负担过重的苦恼：“余亦孱懦人耳，非有二口四目，然一侄女出嫁，而多一侄婿之累；以侄婿之故，而多一侄婿之叔之累；以侄婿之叔故，又多一与之偕来者之累。更不知他日汝等各有家室，其所以累我者当何如也。”⁵直到去职前的1933年林损在家信中还言道：“北京大学昨发欠薪支票一千元，付款之期约在五年以后，是时汝年亦二十矣。”⁶

欠薪使林损常靠兼课来贴补家用。1926年林损致姊丈蒋育平云：“弟本年功课稍多，中国大学一来复九时，所讲授功课凡四种；师范大学三时，所讲授功课凡两种；北京大学六时，所讲功课凡二种；又女子师范大学义务功课四时，凡两种。每来复计功课二十二小时，每日平均四小时，又须编讲义，兼以东西奔驰，劳累殊甚，而月入尚不及四百元，读书人之生涯，可胜浩叹哉！”⁷欠薪状态下的大学教员为钱而四处兼课，上课免不了会敷衍了事。当时的一名学生谢承平投书《现代评论》谈教授们的上课状态：“假使教授说得眉飞色舞，还可以叫我们不必隐几而卧。现在呢？领些零碎不全的讲义；至于参考书更没有，上堂免不了打盹，身坐着而心不在焉，想到经济问题和这样下去究竟怎样办等等问题，教授既忙于做自己的事，想法子糊口，没有功夫预备功课，上堂敷衍三四十分钟，无精打采地说说。”⁸师生都感觉当时北京教育界欠薪程度之严重。其时林损基本生存需求难得解决，加之性情慵懒，著述少，其“苦”可想而知，正如1929年一封家书所诉：“四十之年，忽付流水，前尘如梦，后顾益艰。北京百物腾贵，殊出意料，寓中力加裁省，每月非二百金不可。每思再兼一事，而余精力颇衰，实难为役。贫病交加，行叹坐愁，时顾纸墨笔砚，皆欲焚之，断手不为文章，绝口不谈书卷，庶亦避祸之一道，非徒感愤而已。”⁹疲于奔命兼职数种，林损始终无法与钱产生和谐。

林损如此缺钱在于不止自己的小家庭需要供养，远在老家的大家族也需要自己赡济。家信中

频繁言及汇钱之事：“兹由农工银行汇寄大洋二百元，聊充日常家用，并为汝等添置衣服之需，年内定可再寄，幸毋虑。”“兹由农工银行汇寄大洋三百元整”、“兹由中国银行汇寄大洋壹百元整”。现实是北大不能按时发放薪水，“予月入四百金耳，校中又不时发”、“学校扣薪半年，房租增收一倍，合计大洋三千余元耳”。经常欠薪让林损发出“北校近又欠薪，时寒时热忽富忽贵，天时人事，每相参也”这种无如之何的喟叹。

家信中的林损实在是一有担当、有慈爱的温温长者、顶梁支柱。然而借债、还债、租房、疾病、物价、纳捐都困扰着林损。在1936年家信中林损感叹作为一名教授辛勤工作二十余年尚且难以自保，何况是其他人。北大的教职对林损来说最大的用处是一份还能吃饭的职业，虽属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也觉可惜。1930年一封家信说，“余居此甚适。广东河南皆以重金来聘，然似较北平尚逊；南京亦以监察院委员相诿，余一笑谢之而已。”¹⁰虽有他地待遇优厚，但权衡利弊，林损还是以留在北平为佳。

像林损兼职他校以谋生计在北大并非个案，实乃普遍状况。此时的北京大学内有教员为谋生四处兼职，外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央大学等其他大学的兴起，北大实有“内忧外患”之势，所以中兴北大的建议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胡适日记1931年1月13日后粘贴的简报详细记载具体计划：

- 1、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共四十万元，作为特别款项，以五年为期。
- 2、此款之用途有五：甲设立研究讲座、每座年俸自六千元至九千元。乙设立专任教授、每座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六千元。丙每一讲座教席各附有相当之书籍设备费。丁设立助学金额，以援助苦学之高材生。戊设立奖学金，为奖励研究有成绩之学生，在国内或国外作高深研究之用。¹¹

做出如此决定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今日大学教育发展碰到三层最大困难：一为教授俸给太低。二为学校经费不固定。三为学校经费十之七八用在薪俸，无余财以购置书籍仪器，故虽有专门学者，亦不能专力作高深之学术研究。自此这项计

划逐渐在北京大学实施，只是除旧布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胡适年谱》记载，“1933年4月13日，写信给马幼渔，商量国文系课程裁并事。26日马氏复信，不赞成裁并过多。”¹²课程的裁撤意味教员的解聘。尤其是中基会规定“研究教授之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经顾问委员会审定，由北大校长聘任”¹³，以林损学术著作之少，并无多少心力致力现代学术，再加之林损（林损是北大国文系里学衡派成员）与胡适视之为对立面甚为讨厌的学衡派往来较密，他在北大的教职实有不保之虞。

二

林损与胡适，一个守旧，一个趋新。二人仿佛势同水火，不能相容。胡适文字中提到林损之处并不多，且时有较为温和的评价。林损文章里提到胡适之处意气之词不少。1920年林损给陈穆庵表侄的信：“胡适鸡狗虫豸，更无所置之。设速朽之业，以邀不朽之名，自古断无此理。昔尝戏驳其说，凡数百条，批隙导窾，颇云砒然，既而秘之，诚不忍割鸡以牛刀也。”¹⁴林损还做了一首《醉笔书愤》的诗，后四句是：“死矣奴才胡适之，累予心痛到今时。行哉铁铸人间狱，他日须哀屈膝期。”¹⁵林损谩骂的背后是他与胡适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胡适提倡白话，林损不赞同。“乾坤之运，不能无变，文学之变，由来亦久，气化推移之中，必有刍狗筌蹄之设。昔之八股，独盛五百年，及今一蹶，遽为灰烬；白话虽行，未若八股，灰之烬之，不待五百年也。”¹⁶二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政治思想的态度。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以及提倡“好人政府”，林损深不以为然。林损在《昔士》一文中：“夫谓中国可暂亡五十年者，此何言也？谓中国无文化者，此何心也？谓宜弃国粹而一归于欧化者，此何理也？排除老成而抵斥异己者，此何行也？拜夷酋而随戎师，此岂出于五藏哉？……‘好人好人’，罪恶假汝以行！”¹⁷文章驳斥的是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信心与反省》中的观点以及胡适尊奉杜威的事情。林损这些针对胡适的看法夹杂意气，没有在学理上对胡适进行反驳。他将胡适看做自己的对立面，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由学

术上思想上的对立再到人事上的针锋相对。1920年5月31日朱希祖给胡适写信表示歉意，原因是林损因为学生孔家彰升班的事而迁怒胡适，以为胡适从中作梗。朱希祖跟林损说此事与胡适无关，林损却“愈闹愈甚”，使得朱希祖很难堪。¹⁸

1934年林损解职，旁观者刘半农在4月16日日记里写道：“下午到一院上课，忽于壁间见林公铎揭一帖，自言已停职，学生不必上课云云。殊不可解。电询幼渔，乃知梦麟嘱郑介石示言公铎，下学年不复续聘，你先为之备，公铎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不求长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责梦麟也。”4月20日又记：“到马幼渔处小谈，梦麟已决定辞退林公铎、许守白（许之衡字守白）二人，并以适之代幼渔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幼渔甚愤愤也。”¹⁹刘半农与林损本是互有恶感，此番话却是持平之论。林损心气甚高在文章中已有充分显露，种种原因荒废宿业也是不争的事实。“好骂人”这一点在时人笔下多有记载，夏承焘1940年10月27日日记：“一帆来，谈林公铎事。其人骨头自硬，可入独行传，惟太好骂人耳。”²⁰林损高标独举，有爱憎，有热肠，但好骂人，不善结党，变得“益狂益穷益傲益寂”，使得林损越发以老名士自居。

此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联手裁汰旧员。蒋梦麟能大刀阔斧改革，胡适是其重要倚靠。向来心气甚高不合流俗的林损既不会坐等蒋梦麟径行将其开除，也不会无所作为。在被炒得沸沸扬扬之前，林损只有自行去职既能保持节概又较少受人非议。林损1934年4月23日家信说：“余已辞职，备详报载，欠薪可支一年家用。南京、广东、湖北、安徽纷来聘请，下半年不患无事。务即禀明祖母大人，请其宽心。”信中多少还是宽母亲和子女们的心。但林损还是将不再续聘以致有失业之虞这笔账算在宿敌蒋梦麟、胡适的身上，于是就有了林损写给蒋梦麟胡适的抗议信，兹引致胡适的信：

适之足下：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遇于文字者微矣。

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议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遭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致高明。

比对林损文集中其他提及胡适的文字，此信文风实有一脉相承之处。林损的性情显于外面是孤傲自负、睥睨群伦、使酒骂座。此信风格只是林损行事做人原则的体现。不久林损就赴南京执教国立中央大学。

胡适在日记中对北大中国文学系的改革做了如下评论：“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²¹在胡适眼里，林损“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是“最无用的旧人”中的一个了。

三

比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定章程，不再续聘林损亦是师出有名，何况不再续聘并不针对林损一人而言。蒋梦麟明确解聘林损，胡适也与闻其间，胡适1934年5月30日日记，“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损去职事件中各方人物的反应。

马叙伦认为林损去职是“时时薄胡适之，卒为适之所排而去也”²²。史学家朱希祖认为“公铎又新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²³黄侃觉得“林君辞职，不胜惋惜，隋侯之珠，何致弹雀。”²⁴表达惋惜之情。傅斯年1934年4月28日给胡适信，“今日看到林损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此辈之最可恶者非林而实马（指马幼渔），彼乃借新旧不同之论以欺人。试问林马诸丑于旧有何贡献？此小人恋栈之恶计，下流撒谎之耻态耳。越想越气，皆希努力到底！”²⁵废名致函胡适：“若林损之徒应该开除，无须要别的证据，只看他胡乱写的信便不像是读书人，何能教书。”²⁶

林损离职本是一件平常之事却引来诸多议论。上引诸人的言论有的同情林损，有的认为开

除林损是大快人心，有的指向胡适党同伐异，言外之意胡适乃一学阀，掌握学术界高等教育界生杀予夺的大权。林损主动去职以自挽颓声的举措在时人眼中仍不过看作是被蒋梦麟胡适变相开除罢了。事实真相与对事实的评价、态度总因各样人物亲疏远近、所站立场不同而不同。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1页。

2陈西滢：《西滢闲话》，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54页。

3林损：《林损集》，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546页。

4林损：《林损集》，第1570—1571页。

5林损：《林损集》，第1641页。

6林损：《林损集》，第1662页。

7林损：《林损集》，第1564页。

8谢承平：《怎样解决我们的读书问题》，《现代评论》，1926年11月27日，第103期。

9林损：《林损集》，第1644页。

10林损：《林损集》，第1647页。

11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册，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12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175页。

13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册，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14林损：《林损集》，第1580页。

15林损：《林损集》，第725页。

16林损：《林损集》，第1580页。

17林损：《林损集》，第1126页。

18朱希祖：《朱希祖书信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0—271页。

19刘小蕙：《父亲刘半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264页。

20林损：《林损集》，第1857页。

2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9页。

22林损：《林损集》，第1761页。

23朱希祖：《朱希祖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14—415页。

24林损：《林损集》，第1500页。

25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413—414页。

26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第586页。



行走画境的上庄



雪浴上庄



山林如醉

上庄摄影作品三幅
章恒全先生摄影并提供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修订)

《胡适研究通讯》于2008年2月创刊，至今已六年。由于得到海内外学界朋友的大力支持，这个刊物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起到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的作用。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5万字左右，于每季度的第三个月（即每年的3、6、9、12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胡适研究会的内部刊物，供学会会员及相关学会间交流、阅看，非卖品。每期印制200份左右。其电子版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网站上查阅。

《胡适研究通讯》自2013年第3期（总第23期）起，向作者致送稿酬。作者来稿，于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凡决定采用的稿件，即通知作者，此稿即不宜再投给别处。凡一个月后仍未得到通知的作者，其稿作者自由处理。

凡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本《通讯》不再刊登。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每篇文章的具体观点，自然由作者自负责任；本《通讯》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为从事胡适研究的朋友们以及对胡适有兴趣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